



学习手册

基础版

清华大学学生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会 编辑部

2017年3月

目录

编者前言 2

第一章 为什么会有贫穷? 3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综述 9

第三章 价值理论 24

第四章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34

第五章 民族问题：历史与理论 40

第六章 女性与 LGBTQ+ 的平权运动 45

编者前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会编辑的一本马克思主义入门读物，可供希望了解相关理论的同志作为学习、讨论的材料使用。这本材料分为现实（第一、四、五、六章）、哲学（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第三、四章）三个部分，每部分都有若干论著摘编或综述，以及编者的评述。哲学、政治经济学部分摘选的主要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以及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典型文献；现实部分除了包含一些经典理论，更多是收集一些反映现实情况的学术文献与数据案例。

限于篇幅，文献的摘编不可能涉及其所有要点。对于某些原作者用了较长篇幅论述的要点，便不再大段地摘录原文，而是将要点在综述和简评中进行概括。综述和简评力求客观地介绍所选文献本身的思想，但若涉及到对这些思想的评价，则必然体现研究会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它拨开纷繁的表象，直指历史运行的直接推力即生产实践活动；在此基础上，它无情地粉碎所有粉饰压迫的说辞，并对种种看似合理的压迫展开最猛烈的进攻。**所有的评注都将是这个基本立场的延伸。

但大体说来，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思潮持**开放**的态度。研究会有一条明确的底线：**与以“马克思主义”之名行国家主义、沙文主义或（小）资产阶级反动社会主义之实的思潮划清界限。**在此之上，研究会批判地吸取马克思主义思潮之下各个流派的优点。研究会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与时俱进、自我革新，而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并为人的解放指明方向。因此，本辑材料有意淡化某些关于“派别”的成见。

例如，材料中既有对斯大林主义和毛派倾向文献的摘编，也有对托洛斯基派如第四国际文献的摘编。进一步地，在左翼思想史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与发端自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然而研究会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乃至自七十年代以来在左翼知识界影响颇广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一思潮尽管属后-学范畴，尽管将阶级消退误认为是非历史的现象而看不到实在的阶级对抗，但它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当代解读却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因为这一思潮确实是抓住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景观化与符号化的特性）都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现象所进行的回应，它们确实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挥。

我们认为，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的思想资源中，吸取学者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诸种特性的洞察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与延伸，以此为现实的批判与斗争提供更切中时代脉搏的武器。

这一辑材料的编辑是非常仓促的，选取文献也难以避免地体现出编辑们的主观好恶和认识局限。有许多材料由于时间所限以及篇幅所限，也未能加入本手册中，比如现实问题中的农业问题、工人运动问题、医疗住房问题，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金融理论、消费理论等，还有哲学理论中各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详细介绍。显然，这些话题对于今天的运动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将很快编撰出进阶版的小册子，届时会与诸位读者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总之，欢迎诸位同志进行批评、指正。

在编辑这本材料的过程中，清华大学求是学会的同志给予了大力协助，不仅贡献了相当多的综述，也针对材料的架构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一章 为什么会有贫穷？

一、教育与贫穷

常常有人说，穷人穷是因为懒惰、愚笨。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很多穷人因为学历不高而找不到好工作，而这是因为他们从前成绩不好，是不努力学习或者天生愚钝的结果。

的确，个人的智力和主动性毫无疑问会影响学业，影响未来的收入。但是，我们要问：难道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不会影响其子女的智力和学习主动性及其发挥吗？

恰恰相反，这个因素的影响非常重要。

首先，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儿童智力的培养。

教育资源、家庭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不必多说，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都能对智力产生很大影响¹。中国农村地区缺铁性贫血、寄生虫病泛滥成灾，农村学生认知水平和智力水平受到了巨大损害。有学者指出：给贫困、农村地区学生每天 2 毛钱补充维生素，每年 2 元钱驱寄生虫，就能显著提升这些学生的成绩，但政府对此投入乏善可陈。

其次，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儿童智力的发挥。

美国学术期刊《心理科学》在 2003、2011 年曾刊登过两篇论文²，都指向了一个事实：在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个体间的基因差异无法得到充分体现，而在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个体优势则能得到更好的发挥，从而使基因差异占更大的比重。比如：在低地位家庭，基因因素仅占 7 岁儿童智力测试成绩的 10% 左右，在高地位家庭，基因因素则占其成绩的 70% 以上。

举例来说，假如你和你兄弟出生在穷人家庭，你天生就有音乐天赋，你兄弟没有，然而由于家里没有钱培养你学音乐，因而你最终很可能和你兄弟一样，并没有什么音乐成就；相反，如果你们生活在富裕人家，你的音乐才能就能得到培养和发挥，最终你的音乐成就就远远地高于了你兄弟。

最后，社会经济地位也影响“不听话”基因之作用的发挥³。

2008 年，撒内汉等学者的研究指出：如果其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并且父母经常参与他的学习活动，同时学校教学质量较好，那么，DRD2 基因（通俗地说，拥有该基因的人更“不听话”）对升学的负面影响将会被抑制。

国光等学者的研究也发现：DRD2 基因和 MAOA 基因（另一个“不听话”基因）的遗传影响是有条件的。如果家庭、学校和社会网络能够发挥强有力的社会控制效应，那么遗传变量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影响就会大大减弱。相反，如果家庭、学校和社会网络所提供的社会控制较弱，那么遗传变量对越轨行为的影响就会大大增加。

因此，当我们说“除了环境因素，基因等因素也很重要”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连遗传基因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本身，都是由环境、由社会阶层决定的。

¹ Xuehui An et al. Teaching Quality and Student Outcome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Educational Engagement in Rural Northwest Chi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8. Renfu Luo et al. Nutrition and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in Rural China's Elementary Schools: Results of a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in Shaanxi Province. Chicago Journals. 2012. REAP Brief. Are We There Yet? The Long Road to Eliminating Undernutrition in Rural China's Schools. 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 转引自：黄童超，没有多少寒门学子能靠高考改变命运，网易《回声》，<http://view.163.com/special/resound/ruralstudents20160707.html>。

² Turkheimer E, et al. Socioeconomic status modifies heritability of IQ in young childre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3, 14(6):623-628(6). Elliot M, et al. Emergence of a Gene \times Socioeconomic Status Interaction on Infant Mental Ability Between 10 Months and 2 Year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1, 22(1).

³ 胡雯,等，分子遗传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影响社会学研究，2012 年第 5 期。

由于环境的影响，穷人子女智力发育可能会受到阻碍，其所拥有的优势基因也很难发挥作用，同时还受着劣势基因更大的影响。穷人家庭还可能因为经济状况而不能支持子女上学，即使其能力本足以继续读书。

总而言之，各阶层子女之间学业成就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因他们成长的外部环境不同而造成的。

而如今，各阶层子女间的升学差距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许霓妮等学者指出⁴：2010年，15-17岁学生的高中入学率只有52.9%。2007-2013年，每100个进入初中的贫困农村学生，只有69人能毕业，46人能进入高中，37人能从高中毕业。相比之下，约有90%的大城市学生能进入高中就读。

学者王伟宜在2005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⁵：辈出率——某一社会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与该阶层人口在该社会全体职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之比——最高的阶层，是私营企业主阶层（5.93）。其辈出率是最低的无业失业者阶层（0.47）的12.6倍，是工人阶层的7.8倍，农民阶层的10倍。换句话说，企业主子女比农民子女考上大学的可能性要高十倍。

2013年，王伟宜一口气计算了1982、1990、2000、2010年的数据，得到了这样的结果⁶：2000年之前，阶层间辈出率的最大差距逐步扩大，在2000年达到了43.6倍，**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农民阶层子女的43.6倍。**

2010年阶层间辈出率的最大差距有所下降，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工人阶层子女的30.1倍。作者推测，重点大学中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比例的减少，一方面有大学扩招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出国，获得了更好的教育机会。2010年有20万人因出国留学而放弃高考，占当年录取人数的3%，这里还未计算从中小学就出国念书的学生。

所以，当我们说“你又不是大学生，当然收入低”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将原因简单归于当事人的不聪明或不努力，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家庭“原本就收入低”。

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的那样——**教育总是有助于社会结构（阶级结构）的再生产。**让穷人的子女得不到好的教育从而继续受穷，是教育系统的客观要求，是不平等经济制度下的必然产物。

试想，人人都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在这个社会可能实现吗？即使我们通过向富人征税，做到了公立学校资源平均分配，使农村孩子也能上高质量的中小学，我们又能阻止富人选择更高级的私立学校吗？我们又能阻止他们利用自己的收入替子女购买丰富书籍，请高级家教吗？

试想，即使人人都拥有了平等的教育机会，得到高级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而高级高薪的工作依然是有限的，这个时候，还有多少人愿意去做那些低薪的工作呢？他们的心理将产生多大的落差？这难道不是反而不利于这个社会结构的稳定吗？**不平等的社会本身就不需要平等的教育。**

归根结底，穷人受穷的原因还是要从不平等的经济制度中寻找。

⁴ Fang Chang et al. China's Looming Human Capital Crisis: Upper Secondary Educational Attainment Rates and the Middle Income Trap. 2016. 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Yaojiang Shi et al. Dropping Out of Rural China's Secondary Schools: A Mixed-methods Analysis. The China Quarterly. 2015. 转引自：黄童超，没有多少寒门学子能靠高考改变命运，网易《回声》，<http://view.163.com/special/resound/ruralstudents20160707.html>。

⁵ 王伟宜，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研究，民办教育研究，2005年第4期。

⁶ 王伟宜，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的阶层差异状况分析：1982—2010——基于我国7所重点大学的实证调查，教育研究，2013年第7期。

二、新工人的现状

穷人之所以穷，其根源还是在经济制度之中。具体地说，就是穷人作为劳动者的待遇太低了，或者欲劳动而不得。

那么，穷人的劳动待遇究竟如何，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首先，囿于篇幅所限，本节所说的穷人，主要指的是受雇佣的农民工。因为农民工占据了就业人口的35%左右，而占据另外35%的农民群体，他们要么作为前者的家属分享其收入，要么大多在未来也将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工人。对于这个占就业人口70%的群体而言，他们毫无疑问是穷人群体中的重要构成部分，特别是其中的工人群体。

在农民工中，也有16.6%的人是自我雇佣者，例如小摊贩或小店主。此外还存在一定比例的城市贫民阶层。虽然他们有着自己的特殊性，但是他们与受雇农民工一样，也处于被资本与权力挤压生存空间的境地中，而且在后者身上，这样的矛盾体现得更为突出。我们在此主要论述受雇佣农民工的情况，就是因为穷人贫穷的原因在他们身上的体现更为鲜明和典型。

根据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我国2.77亿农民工月平均工作25.2天，平均每天工作8.7小时，合计平均每月工作219.2小时。而我国劳动法规定的每月劳动时间为166.6小时，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可见，**我国农民工平均每月超时劳动16.6小时。**

在富士康等企业，工人们在生产旺季的平均加班时间能达到80小时一个月，有些工人甚至加班160小时⁷，达到了19世纪欧洲的工时水平。在有的企业，工人们还会被要求“义务”加班而没有加班费。

有的企业的工人工资的确高于平均水平，但他们的劳动时间与强度更是远高于平均水平。譬如华为的工资高于业界平均水平，然而其工作强度又比平均高出更多，正如任正非自己所说：华为要让三个人拿四个人的钱干五个人的活⁸。工人劳动越辛勤，受到的剥削反而越深重。

李钟瑾等学者认为⁹：“**工资过低和超时劳动是现有发展模式的一对双生儿。**正是因为过低的工资不足以让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获得能够维持自己和家庭再生产的收入，所以才会出现普遍的劳动超时。”

他们在2012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根据城镇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划定的生存工资，平均为当地法定最低工资的2.3倍。东部地区的平均差距高达2.5倍，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平均差距也分别有2.3倍和2.1倍。

因此，1.5亿外出农民工所面临的事实就是：“如果只在正常时间内工作，那么就必须依靠农村维持家庭再生产；而如果要使家庭在城镇生活，就不得不超时劳动。而对于占农民工总数一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超时劳动将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因为他们更期望留在城市生活。

以深圳市为例，法定最低工资2030元，“生存工资”应为5000元左右，占当地社会平均工资（8141元）的60%。笔者在调研中观察到，在深圳市，2千多元属于收入最低的岗位，一般由待遇要求低的大龄工人来从事。3千多元是在外来工中比较普遍的工资水平（对于普工而言，也要加班才能达到）。如果级别高一些、技术熟一些、待遇好一些、加班多一些（在富士康就是160小时），可以拿到4、5千元。而即便是竞争很激烈的管理数十人的中层，底薪也就是6千元左右，算上提成等，也许才能达到社会平均工资。

可见，**对于大多数基层劳动者来说，若要满足在城市生活的需要，就必须拼命工作以拿到4、5千元的生存工资。**对于大龄工人来说，他们一般还有子女赡养，也不计划留在城市养老，因而大多不必争取这份

⁷ “新生代”ilabour 课题组，关于富士康公司工资、工时与工会调研，中国工人，2015年第8期。

⁸ 任正非：三个人拿四个人的钱干五个人的活是公司的期望，TechWeb，http://people.techweb.com.cn/2013-07-19/1311136_1.shtml。

⁹ 李钟瑾、陈瀛、齐昊，等，生存工资、超时劳动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3期。

收入（由于他们的年龄限制，也很难争取）。但对于承担家庭重担和消费需求更大、更愿意在城市安家的中青年工人而言，这份收入就是宁愿超时劳动也要努力争取的了。

除了压低工资，让员工超时加班，企业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还可能会通过以下种种手段支配工人，损害工人的利益：

首先，很多企业不为员工缴纳社保，有的企业甚至自创一套缴纳办法来忽悠员工，置其养老、医疗、工伤等权益于不顾；很多企业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以便于自己欺骗工人、规避责任；还有很多企业通过种种办法避免与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以图掌握灵活辞退员工的权力。**2014 年，购买了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比重仅为 16.7%。2015 年，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为 36.2%，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比重仅为 12.9%。**

有的大企业在社保和劳动合同方面依法办事，但为了抵消成本，获取更廉价的劳动力，它们与学校签订协议，大量招收学生工¹⁰。据笔者观察，在有的部门，学生工的比例甚至能达到 70% 以上，例如高档酒店的餐饮服务、迎宾接待等部门。学生工为这些企业节省了大量成本，因为其工资可低于最低工资限制（在深圳就是不到 2 千元），也不用购买社保，而且每年都有稳定的来源。

除此之外，还有企业不按法律支付加班费，**2008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 1/4 的农民工表示加班没有加班工资¹¹**；有的企业设定过高的生产指标，提高强度而不涨工资；有的企业玩文字游戏、数字游戏，工资明涨暗跌；有的企业随意克扣、拖欠工人薪资；有的企业大规模使用派遣、外包工，从而利用廉价劳动力，规避社会责任。

根据 2015 年发布的多校联合调查数据¹²，高达 53.4% 的建筑业农民工在 2014 年遭遇欠薪，结清工钱的（包括通过讨薪而结清的）的比例只有 60.2%。有 10% 的建筑业农民工在 2014 年颗粒无收。在建筑工人讨薪所涉及的相关职能部门和工会组织中，介入频率最高的是劳动监察部门，但其介入的无效性和不作为的比例高达 65.2%。并没有起到有效的监察作用。

2011 年全国总工会发布的《国内劳务派遣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劳务派遣人员总数已经达到 6000 多万。国有企业成为劳务派遣用工泛滥的重灾区，部分央企甚至有超过 2/3 的员工都属于劳务派遣。**在有些央企分公司，派遣员工比例更是高达 80%¹³。**

更令人痛心的是，有的企业管理粗暴，工作环境恶劣，不惜严重损害劳动者的身心健康；有的企业面对工伤、职业病，采取罔顾法律、不负责任的态度，可谓铁石心肠。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显示，广东省在 2012 年内光是官方认定的工伤受害者就达到 19.6 万人，占全国同期工伤个案总数 17%。2014 年的《全国职业病报告》显示，当年全国共报告 29972 例职业病案例，其中 89% 为职业性尘肺病。2013 的一则报道称¹⁴，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37.8% 的职业病患者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赔偿。而获得一次性赔偿的患者，有 78% 表示这些赔偿无法保障其后续的医疗和生活。**“大爱清尘”的志愿者们发现，每年在贵阳市肺科医院治疗的尘肺病患者约 300 余人，其中仅有不到 20 人成功索赔。

对于工友而言，获取赔偿的法律程序异常痛苦。由于企业用工不规范，大多数工友很难收集齐索赔所需的证据。从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直到最终索赔，有关机构往往全拖到最后时刻办理完毕，使得时长可达 1149 天。如果用人单位不服而提出仲裁，最长则需要 1514 天。这还不包括对存在过错的用人单

¹⁰ “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2010 年 9 月。

¹¹ 陈小娟,汪建华,刘洁,等,珠三角外来务工人员工作权益与生活状况——基于 2008 年问卷调查的描述,珠江经济,2008 年第 11 期。

¹² 汪晖,潘毅,杜绝建筑业欠薪,维护底线尊严,环球时报,2015 年 3 月 4 日。去年 600 万建筑工人遭欠薪 委员:应让农民工加入工会,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a/20150314/43340599_0.shtml。

¹³ 东莞 1650 家劳务派遣公司 仅 657 家有经营许可证,东莞时报,2014 年 12 月 1 日。

¹⁴ 职业病:劳动者不能承受之重,检察日报,2011 年 3 月 2 日。

位要求民事赔偿的诉讼时间。甚至，还有一些诊断、仲裁机构被企业所收买，刻意阻碍工人获得赔偿。很多人因为缺乏时间精力与经济条件而放弃了索赔，很多职业病人还未走完程序便已不在人世。

最后，很多企业会想法设法地阻碍工人的团结与抗争。比如拆分同乡、同学，避免跨部门、跨地区的交流，从而避免工人之间的团结；在对话谈判中，有的企业会许诺空头支票，欺骗工人、拖延时间，除非工人罢工逼迫其拿出诚意；而面对罢工，有些企业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比如恶意解雇组织工友维权的工人代表，或者内定、收买工人代表，利用胡萝卜加大棒分化工人，甚至利用黑社会，乃至国家机器来打击工人。

在劳资纠纷中，政府往往不作为乃至偏袒资方，因为资方的效益关系到他们的政绩、福利乃至一些非法收入，而同时工人又难以给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在以往的多起案件中，就发生过警方直接进入厂内强迫复工的情况¹⁵。

尽管现在直接施加在工人身上的压力或有减小，但施于劳工 NGO 身上的压力却愈发增大。伴随着有关法律的实施，劳工 NGO 现有的协助工友维权的一些行动，将更加难以进行。缺少了一些帮助和指导，工人的维权乃至罢工将更有可能遭遇失败。

尽管我国的一些法律给予了劳动者很多保护，但是这些法律并不是工人通过斗争争取来的，而是自上而下地赐予的，因而实际上并没有充足的力量支撑其严格地实行，甚至还很容易被修改、抛弃。

事实就是：伴随着近年来的经济下行、企业利润率下降，政府高官频频发出“《劳动合同法》偏袒工人，有损用工灵活性”之类的言论，甚至“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也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之一被写入了中央文件。

一些原本在逐步推行的有利于工人的举措，也被搁置、取消，比如工会的民主选举、集体谈判等。更别说原本就不利于工人的规定了，比如工作中发病两天内死亡才算工伤，被欠的社保只能追缴两年等等，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被取消。**这些现实都反映了工人与资本在政治领域中的力量对比。**

可见，**工人可谓是处于资本全方位的支配之中**，无论是在工资工时方面、社会保障方面、身心健康方面，还是政治权力方面，工人都处于力量对比中劣势的一方、利益容易受损的一方。

尽管不可能所有资本家都是黑心老板，党政机关也不可能始终都只考虑资方利益，但正是现存的权力关系使得这类损害成为可能。**对于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种资本对工人的支配，我们就称为“剥削”。**

工人的失业也是资本在另一种意义上对工人的剥削。资本必须维持一个庞大的工人后备军，来刺激他们的雇员为了防止被取代而拼命工作。部分工人的失业与部分工人的过度劳动是相辅相成的。并且，资本主义社会无计划的产业更新，也使得许多工人在被机器排挤出企业后，一时间无所适从，工作待遇、生活质量顿时下降。由于资本逐利而引发的经济危机，更是导致工人遭遇此种情况的罪魁祸首之一。

劳动者是受剥削的一方，这就是贫穷问题最关键的答案。

如果有人说，工人的工资纯粹就是由市场贡献所决定，而不是力量对比的结果，**那你就绝对忽视了工人数百年来争取权益的斗争，从而抹杀了资本与工人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事实证明：在资本支配工人的总体上始终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如果工人通过团结增强了自己的力量，那么工资等待遇无疑会有一定的提高。

正是由于工资过低、工时过长，1886 年 5 月 1 日，美国数十万名工人才会走上街头，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最终在 1938 年迫使美国政府颁布了《公平劳工标准法》，设定了最低工资与最长

¹⁵ 参见：2015 中国工人阶级处境明显恶化的主要表现，工评社，<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4586&extra=page%3D1>。

工时。现如今，我们虽然依旧纪念五一，但它却成为了消费主义的黄金小长假，而无人关注八小时工作制仍未落实的现实，这真是一个十足的讽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通过论述工人阶级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指出了：“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国家法律对工人工时的各种规定，“绝不是议会设想出来的。它们是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从现存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制定、被正式承认以及由国家予以公布，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¹⁶

工人争取权益的斗争还会有种种不同的内容。例如要求付薪、涨薪、补缴社保、经济补偿等物质利益，反对综合工时等损害工人利益的制度，要求集体谈判、建立民主工会等劳工权力，乃至更进一步的政治性诉求。如果不是历史上这一个个的斗争，即使企业生意繁荣、利润丰厚，工人的待遇也未必会自动提高。2010年发生在本田汽车厂的罢工，就是因企业利润丰厚但工资过低而引发。

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只要市场允许，资方将尽可能地提高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尽可能地使工人耗费更多的劳动，尽可能地占有工人更多的劳动，孤立的工人处于完全的弱势中。

这不仅是因为有的资本家唯利是图，也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如果不尽量压低自己的成本，就无法承受更残酷剥削工人的企业的竞争，这些资本家就无法生存。只有通过立法等形式，逼迫所有人都遵守这一规范，承担这一“成本”，才有可能尽量削弱“逐底竞争”。

关键在于，这样的规定在**工人阶级没有团结起来抗争的国家**是不存在的，或者说不稳固的。如今发达国家工人享有的待遇，是他们的先辈通过团结抗争拼死得来，或是国家惧于工人的力量而主动设置、维持的。尽管这些优待很大程度上基于发达国家资本对其他国家的剥削，而不是资产者吐出了对本国人民的剥削，但如果没有工人的强大力量的话，这些利益也只会被资产者独吞。

当前，中国工人在斗争中体现出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广泛的组织未能建立，政治性、变革性的诉求也未能提出，即使是温和的改良诉求也常常得不到满足，社会主义运动在工人中的影响还很微弱。

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剩余价值就是对这一不平等现实关系的反映**，在接下来的第二章、第三章中，我们将进一步阐述这一理论的基础。

¹⁶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326页。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综述

一、一个常见的误解：线性历史观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有一种误解极为流行。不论是吹捧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官方教科书，还是贬低马克思主义“将人类历史强行划分为五个阶段”的反对者，大都掉入了这种误解之中——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图景是这样的：因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社会意识，所以当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暴力革命就会发生，社会将在暴力革命中从落后的形态进入到先进的形态；历史的发展由此划分为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必将消灭，共产主义必将胜利。”

这就是著名的“历史五阶段”理论，又称为“线性历史观”。它最大的特点即在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描绘了一个演化蓝图，仿佛历史的发展必然有一个终极的方向和最高的目的，即共产主义社会；尤其是，它给“资本主义必将消灭”和“共产主义必将胜利”划了等号。尽管它声称自己容许历史的“螺旋式上升”，并且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它依然带有强烈的决定论意味。然而，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吗？

可以略微考证一下这种“历史五阶段”理论的历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中，当然讨论过对人类既有历史的阶段划分，但这种划分基本只针对西欧，而且仅仅是一种对既成事实的梳理式的讨论，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各个形态中分工方式的论述。他们却**从未在实证意义下论证过这样的命题**：人类的历史必须经历这五个阶段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因为自身的矛盾走向毁灭之后，共产主义必定能够实现，无产阶级的运动实践只需“顺势而为”，就可以到达彼岸了（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大多数时候都称共产主义运动为“**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而不将它作为一种明确的社会形态来描述）。他们至多以战斗口号的形式写下过这个著名的句子：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共产党宣言》

作为一个庞大严谨的思想体系的缔造者，马克思本人十分反感别人将那种不符合他本意的线性史观归于他的名下。在一封信中，他以一种不失尖刻的幽默回应了赞扬他“找到人类历史发展铁律”的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

那么，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对我的批评家来说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让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看。

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

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利用这种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poor whites”（“白种贫民”）更受人轻视，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中共中央编译局1963年版

这种分析直接驳斥了试图从生产方式来“逻辑地”推理出全部上层建筑的线性历史观。实际上，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就是通过“屁股决定脑袋”的方式来进行“逻辑推理”的，而长于分析的马克思不仅在理论上明确地反对这种论证方式，在对现实的分析中也对此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恩格斯则说得更加明确些：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致约瑟夫·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中共中央编译局1963年版

然而，线性史观毕竟被广泛地接受下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原来是斯大林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撰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节，后来成为了政治教科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最权威的表述。在这一节中，斯大林总结出了“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后来的各种教科书都将这种论述奉为圭臬，为了迎合这种论述，甚至不惜剪裁史料、生搬硬套，例如将所有的历史事件都直接解释成阶级斗争，例如将秦以后的社会硬说成“封建制度”¹⁷。

当然，不能否定这种理论的历史意义。在世界上第一个夺权成功的无产阶级政权面临巨大的战争压力之时，哪里能够有闲情逸致去论战什么“共产主义在何种意义上必然会实现”呢？斯大林的简单化、条框化的表述，对于统一思想无疑做出了重大贡献。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也无疑与这一有力的理论武器有很大的关系。然而，随着情势的变化，这种表述却不再适应新的时代了。在意识形态上，它导致了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不符合历史规律的都要被消灭！”），成为一些历史暴行的理论依据；以及一种流毒极广的弥赛亚情结——对于某些认同“特色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员”，“共产主义理想”竟然等同于某种类似宗教救赎的“天堂”；他们公开地宣称，共产主义尽管是一个高远的理想，但既然它必然实现，即“弥赛亚必然降临”，那么只需要跟着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团走，就总能等到共产主义的到来。就这样，官僚资产阶级为自己的反动行为找到了一种辩护词。——面对这种状况，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来表述，无疑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¹⁷ 关于“封建制度”这个极不准确的提法的辨析，以及对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可参考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读者亦可以将柳宗元的《封建论》作为最直接的参考。在《封建论》中，柳宗元对于经济制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作了非常犀利的概括：“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二. 历史唯物主义（1）：实践特性

在简单地回顾了“历史五阶段”理论的历史之后，对于马克思主义本来的意思，又说些什么呢？先来看看马克思本人的两段论述：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中共中央编译局 1963 年版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中共中央编译局 1963 年版

再次提醒注意一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只是将西欧的既有历史作了划分，而决没有断言这种划分对于一切时期、一切地域都能够成立。

将“物质决定意识”作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时，必须要澄清“物质”和“意识”在此处的所指。“意识”的含义基本可以确定为社会的意识形态。而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这两段话，“物质”并不是指某种抽象的叫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而是指生产实践活动。因此，所谓“物质决定意识”，其实际的意思应当是“生产实践活动是推动意识形态变化的根本动力”。

实际上，生产实践活动是推动一切历史变动的根本动力，在生产实践活动中，所有的一切社会意识——话语、观念、符号编码-解码规则等等——都被生产出来，并且被人的实践活动不断推动而变动着。因此，

决不存在什么永恒不变的神圣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具有革命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基本的分析准则。它打碎一切话语神话，直接指向背后的生产实践活动以及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

例如，“人的本质”就是由人的社会存在而决定的。所谓“人的社会存在”，就是人在社会中所带有的种种社会关系——例如，是哪个公司的雇员，哪所学校的学生，等等。正是生产实践活动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如生产关系），而这社会关系定义了人的社会存在。社会关系不可能一成不变，它受到整个社会中所有人的生产实践活动的推动，因此不存在超验于历史的“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只能在实践活动中生成。

故而，许多关于人的假定，例如“理性人”（自由主义经济学）、“力比多或性力驱动的主体”和“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理论）、“追求自由的万物之灵”（各种人本主义思潮）、“男女结合是唯一必然的方式”（各种“异性恋霸权”）等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都是针对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的人才能够适用的抽象概念。

举例来说，“理性人”的假定就是资本主义在西方全面推翻了封建制度后，对于广泛产生的逐利行为的一种理论概括。它并不适于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不探讨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因为马克思主义宣告这个问题无意义。当然要看到这些抽象概念对于讨论具体问题的方便之处，但也不能把它们当作是不可变更的绝对真理。

那么，这个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实践活动”到底是什么？

显然，不能将它简单地归结为物质资料的生产，例如生产食物、制造生活必需品，等等。它必然包含对社会总体的再生产。再生产一方面包含着物质资料生产条件的扩大，一方面也包含着社会结构的不断生成：例如，通过教育和规训的方式，保证社会的基本经济秩序能够稳定地运转下去。连宣传这种并不直接创造价值的工作，实际上也是再生产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为它会对人们的意识形态形成影响。

另一方面，社会的再生产也包含着对既有秩序的否定。教育和规训常常不可避免地与人们的实际利益相冲突，这时就会出现斗争——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阶级斗争。除开阶级斗争之外，一切权力的相互博弈，实际上都是人们的实践在推动的。生产实践活动的含义比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谈论的要广泛得多，也远远不一定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除非是为了讨论时说话方便，否则不能单独抽离出一个抽象的“生产实践活动”，因为它本身也是在不断变动着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 error，就在于将生产实践活动完全归结为经济活动，好像只要解释了经济活动，就足以解释这个社会的一切。但这完全是他们所一贯轻蔑的“唯心主义逻辑”。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什么是阶级？

看起来，“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一种十分“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然而，这种说法所代表的逻辑却依旧是历史唯心主义，因为它将社会上的人按照其社会地位的高低和占有财富的多寡粗暴地划分成了一个个“阶级”，而无视了生产实践活动对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这种说法更把“阶级属性”上升为人的唯一属性，而导致了荒谬的“出身论”。然而，阶级斗争远非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因为生产实践活动远非只有阶级斗争这一种形式。

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当谈起“阶级”的时候，所指是被讨论的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例如，资产阶级是在生产过程中占有生产资料的人。重点在于，当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必然需要把要讨论的人放进社会中，研究这些人与其他人的关系；但这些社会关系是随着生产实践活动而不断变动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话语决不是对人本质的界定，而是对生产关系的概括性描述。

总结起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强调人的实践特性。它不是为现存社会秩序辩护的力量（这与中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完全相反！），而是批判地改造现存社会秩序的力量。如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所说，

“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附记：关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简要说明

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写下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发现的。它一经发现，便在知识界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这部手稿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其中一节对于人类异化的讨论。在这一节中，马克思展现出了与老年时代不同的理论旨趣。他将人类的本质界定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而人类的劳动产品是人类本质的外在表现。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的劳动产品，却成为了反过来制约人实现本质的异己力量，或者说，人类变成了自己生产活动产物的奴隶。这就是人的异化。**他怀着极其充沛的感情写下了这段著名的句子，它成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异化最早的批判：

当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能，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青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就是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实现人类本质力量的复归。这个观点与蕴含着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因此得到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拥护。然而，这一观点建立在青年马克思对人类本质的界定上。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马克思就已经在事实上抛弃了这个理论，而发展了强调实践特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即**人类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它只能够在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中不断生成，而不存在抽离于此之外的人类的本质。**由此可以推论说：异化的现象不应从劳动产品与人类本质之间的冲突那里去寻找原因，而应从社会运行机制的根本矛盾中寻找原因。此时，共产主义便去掉了“**人类本质力量的复归**”，而成为了一种不断生成的社会的变革运动。

由此，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争议：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老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究竟存不存在断裂？

旨趣偏向青年马克思的理论家，后来发展出了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他们继承《手稿》中对于异化的批判，更加深入地研究了现代社会的种种病态。这些理论尽管界定了“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类的本质”，但其批判却是振聋发聩的。这一思潮中的许多经典著作，如《启蒙辩证法》《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逃避自由》《单向度的人》等等，都成为了（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光谱中具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著作。

旨趣偏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家，则在理论上旗帜鲜明地反对“回归人的本质”这样的提法。但这种反对，却与维护蜕化变质的党政机器的官僚们完全不同。这些理论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深受结构主义思潮影响的路易·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强调**人的思想与行动受到语言、心理结构（如无意识）、社会生产方式等多种“外在”的结构所左右以至于决定。**因此，结构主义对人的“自由自觉”持深深的怀疑态度。阿尔都塞的理论便指出：**人的生产实践活动生产了社会结构，而这些结构对每个个人的思想都形成了强大的制约和规训，反过来塑造了生产实践活动本身。**这为“人的本质在生产实践活动中生成”加上了一个悲观的注脚。

尽管可以将这些思潮笼统地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潮合流的产物”，但我们依旧可以从这些思潮中汲取不少养分。它们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对于这个思想体系是有相当的贡献的。

三. 历史唯物主义（2）：历史理论

让我们简单概括一下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的基本原则：物质生产活动基于生产力发展，而在人们不断进行生产活动的过程之中，生产力也得到了发展，它会促成物质生产活动的变革，也推动所有的生产实践活动的产物发生着变化。但与此同时，在实践中产生的社会关系，会发展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程度，反过来制约实践活动本身。

本辑材料采纳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表达的观点¹⁸：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现象进行分析的准则，即分析社会历史现象背后的生产实践活动与意识形态等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这些作用对社会历史的推动。因此，它不是什么“宗教信仰”，它所信仰的，只有先于信仰的实践。概括说来，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人类与自己的造物之间从未停息的纠缠与斗争。

对物质生产-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相互制约的辩证特性，应当给出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提法——总体性的主体-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在这里，主体即进行实践活动的人，与客体即实践活动的产物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二者发生变化的根本动力，是人的实践活动，而非社会关系内的某种既定的“趋势”或“历史发展的方向”。因此，没有什么“共产主义是最高阶段”。它更不可能把历史五阶段理论当成唯一确定的描述。

这种辩证法将马克思主义与教科书“辩证法”区别开来：教科书不遗余力地将这本属于社会历史范畴的方法论推广至其它一切领域，如自然科学领域。自然科学往往研究纯粹的客观事物，尽量剥离人的实践活动的影响，因而并不能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总体性辩证法与教科书最大的不同，即在于它明确地将人的生产实践活动放在了最根本的位置上¹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法律、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总结为“上层建筑”。这些上层建筑根植于社会的物质基础（生产活动），建筑在生产关系上，受到它的制约。但决不能将这种制约关系简单地归结成“反映-反作用”。例如，并非每一种社会意识都一定是某种社会关系在人的脑海中的平行反映，最多只能说它的根源在社会关系上。它不一定会直接地反映出社会中的权力关系。

例如，“法律法规”“道德教条”不一定是直接为了统治阶级进行统治而主观地“发明”出来的。它的生成是个复杂的过程，既有既成历史的遗留因素，也有新的生产实践活动推动的因素。它属于意识形态霸权的一部分。意识形态霸权理论，正是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而提出的；在这里，“意识形态霸权”是葛兰西-阿尔都塞²⁰意义下的，即一种建筑在生产关系上的社会意识形态总结构，它发展成了一种不以任何个人（不论是哪个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制约着所有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系统，包括话语、观念、符号编码-解码规则等等。不用这些“现代”的名词，而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中共中央编译局1963年版

然而人的实践活动本身推动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而也推动了这个体系的变化。因此，它不会静止不动。能指系统、道德规定、审美观念、甚至是某些“生理本能”，都是在不断变动的。可以引用这样一段话来加以说明：

我们显然不能认为统治阶级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体系——也就是说统治阶级的舆论效果（“统治阶

¹⁸ 可参考本章第五节对卢卡奇的简评。

¹⁹ 因此，有一些学者主张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论著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谱系中剥离出去。恩格斯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将马克思的辩证法滥用了，这种辩证法本来只适用于分析社会历史领域的问题，而恩格斯却将其附会到自然科学对象上。但恩格斯不应为后来某些政党在某些时期以“自然辩证法”之名控制自然科学研究的做法负责任。

²⁰ 可参考本章第五节对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简评。

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语）——就是一个简单的既定事实，就是**只由那些机构所限定的一个体系**，能够自动复制同一阶级的强制规则或体现有着由其功能规定的一定目标的这个阶级的明确阶级意识。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阶级斗争的既成事实，从来都不可能摆脱阶级斗争本身对它的影响。

——L·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说明》(1976)，孟登迎、赵文译自英刊《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 1983年12月第4期(总第12期)

这更说明了：没有什么永恒的神圣之物。为了解释一个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必须要将它置于这个时期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分析它所产生的物质基础，它与这个社会上的人的关系，以及它如何同这个社会中的生产活动一道变化，才能够得到完整的了解。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是左翼思潮中相当激进的一种，因此在一些整体氛围偏向保守的西方国家会被称作是极左思想²¹。它对思想界最大的影响，自然是为批判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件具有一定前瞻性的强大武器。在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剥削、环境污染、人与人的关系被金钱所算计等等问题面前，很少有人能够对资本主义不持任何批判。然而，马克思的批判却与众不同。

马克思主义首先肯定资本主义所取得的种种成就：资本主义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人的力量第一次在历史上显现了出来。然而，这一切的成就却都建立在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之上。这是各个怀有人道主义关怀的思想家都注意到、并尖锐地批判了的。而**马克思主义敏锐地洞察到这矛盾的图景背后存在的更加巨大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是难以为继的**。与叫嚷“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为的正相反，人的实践活动不一定必然地将历史推向“进步”。马克思洞悉了这样的事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按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进行的生产活动，只能将整个体系导向崩溃**。然而在崩溃之后，并不是必然会迎来某个“共产主义社会”。如果没有形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如果没有产生更适合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这两者不会自己出现，而是要靠无产阶级的某种特定实践即阶级斗争而生成——那么所面临的只能是“社会主义或毁灭”中的毁灭。

马克思主义主张的革命手段，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生产活动社会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这需要适应于更发达的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在推翻旧制度的过程中，必然包含鲜明的暴力革命因素。在这里有两个值得指出的要点。**其一，暴力革命远非马克思主义者首创**，西方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几乎全都使用暴力。民主制度的维持，也极大地依赖于国家暴力机器。显然，资产阶级是否对暴力表达愤慨，取决于暴力归于谁来使用，以及暴力是用来反对谁。只有最彻底的和平主义者才应反对一切暴力。**其二，马克思主义不认为暴力革命是唯一的手段，暴力革命往往起到的是“最后一根稻草”的作用**。马克思本人甚至只将暴力称为“新社会的助产士”（见《资本论》第一卷），他并不相信暴力革命本身具有创造力。

马克思从不谈论共产主义社会的全貌，因为他不是先知，未来社会的具体形态必然是当代无法理解的，只能通过实践不断明确具体的细节。马克思主义也并不设定弥赛亚式的终极目标，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期待救赎的宗教。**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在实践中实现自身**。当“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提及共产主义的时候，他们只是在期待着弥赛亚降临而将他们引向救赎，却放弃了自身的实践特性，心甘情愿地与资产阶级进行合作。当社会的撕裂与冲突愈发激烈之时，他们只是靠着“社会总会越来越好，共产主义必然实现”这样的“信仰”来自我安慰。他们却忘了《国际歌》的这两句歌词：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²¹ “极左”一词在西方不同的国家含义也有很大的差别，极左思潮中也不仅仅有马克思主义一种。从社会氛围而言，美国整体偏向保守，因而美国的极左思想放在更加左倾的欧洲很可能只会是温和左翼思想。

四、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

这一节是承上启下的一节，如果我们要讨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我们首先就要先弄明白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而这一方法首先是基于唯物史观的，在论述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这一点。在之后论述奥地利学派等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流派时，我们也能意识到这一哲学基础的区别。理论派别的分歧根源于其秉承的方法论的差异。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²²如果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发展实践提出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那么就像卢卡奇说的那样，即使我们放弃了马克思的所有具体论点，也不会丝毫背离马克思主义。

1、马克思的抽象方法²³

马克思相信，政治经济学要想成为科学，只有运用“价值”等抽象概念。“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²⁴

抽象的原则，本身无法提供什么知识，困难在于如何应用。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设法确定，什么是要舍象的，什么是不要舍象的。我们要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要研究什么问题？第二，这个问题的本质要素是什么？马克思要研究的，就是“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因为马克思的兴趣是整个社会，特别是社会变革的过程，而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要在（当然，不能仅仅在）政治经济学的领域——生产方式的运动中寻找。

目标有了，怎么才能认识问题的实质方面呢？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要素，强调——发展是在对立物即矛盾力量之间的斗争中实现的。历史在阶级斗争中向前发展，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在阶级斗争体现出来。因此，**构成阶级斗争的基础和以阶级斗争表现的生产关系，就是必须通过抽象法加以隔离和分析的本质要素。**

在资本主义社会，首要的生产关系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²⁵这个关系必须构成研究的中心；抽象力应该用来使它和别的东西相隔离，使它还原为最纯粹的形式。

第一，在最基础的抽象层面上，所有其他的社会关系都要被抽去，只能在往后的、逐渐向现实靠近的某个分析阶段上，将它们逐个地重新引进来。

第二，劳资关系本身，必须还原为它的最有意义的一种形式或几种形式。所谓的意义重大也者，就是有关整个社会的结构特点与趋向的问题。资本家和工人都被还原为某种标准型，一切与考察问题无关的特点都要被抽去。“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²⁶

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劳资关系的实质体现于生产中，但首先，它表现为交换关系，它是一种特殊的交换关系。并且，劳资关系产生于商品生产，即交换关系中。因此，**研究劳资关系，必须从分析一般的交换关系开始。**这样，我们就达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实际起点——对商品的分析，包括对交换关系及价值的分析。这部分内容，我们将在价值理论部分进一步阐述。

其实，从抽象到具体是大多数科学研究都要涉及的方法。在中学物理中我们会将一个物体抽象成质点，解释比较简单的物体运动；要解释现实物体的复杂运动，还需要再引入更多原理，不能再将其视作一个质点了。同样，即使是与劳动价值论对立的效用价值论，个人的主观效用也是抽象的存在，不能直接反映现实价格。

²² 《恩格斯致韦尔纳·桑巴特（1895年3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p. 691.

²³ 本节内容参照了：P. 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p29-43，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²⁴ 《资本论》第一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中共中央编译局1963年版，p. 12.

²⁵ 《资本论》第三卷第51章《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1963年版，p. 995.

²⁶ 《资本论》第三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1963年版，p. 12.

不理解马克思先从具体现象中找到抽象本质，再以此为基础构建理论，逐步接近现实的研究方法，就无法理解马克思的理论。以《资本论》为例，第一卷的抽象层次就与第三卷的抽象层次不同，在第一卷中，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而在考虑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情况、引入利润率平均化原理之后，第三卷里的价格便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

将价值作为基础，不断叠加各种层次的理论，逐步接近价格这一现实，在主流经济学的一些学者看来就是“多此一举”，可以被“奥卡姆剃刀”剔除掉。然而，马克思经济理论要解释的不仅是市场价格等经济问题，它首要针对的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关系的问题。排除了价值理论，就难以理解现实经济运动中的社会关系。这一点我们将在价值理论部分继续阐述。

2、马克思的认识论

哈耶克、波普尔、米塞斯等学者对马克思的认识论的批评影响甚广。哈耶克批评道：“笛卡尔式的唯理主义……宣称，它适用于过去的观点，也就是它适用于未来的那套方案：完全知道自己过去所做所为的人类，也应当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创造出他们的理性过程能够使他们设计出来的那种文明和社会秩序。”马克思的学说也不过是这种“建构论唯理主义”的一份子。²⁷

然而，马克思果真是这么认为的吗？

“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社会党人如果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首要的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方程式。”²⁸

显然，马克思不是一个设计论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由并不是因为设计出了一个绝对可行的理想社会，而是现实的社会环境推动着人们不得不去尝试——这里便涉及到波普尔、米塞斯等人对马克思的另一批判：马克思凭什么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必然消亡的历史规律？

米塞斯称：

“从历史经验无法推导出关于不同行为模式的效果以及一定社会制度的效果的普遍规律。”²⁹“人类行动科学的建立既不能借助于逻辑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所称赞的方法，也不能借助于……统计学所称赞的方法，……这些程序化的方法……只能描述在我们地球某一个地方的某个一定时刻，作为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所出现的复杂现象。”³⁰

米塞斯认为，在人的行动领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关系，因而无法通过经验研究归纳出社会规律。“我们只能对人的理性所能接受的先验公理进行推演，推理出人在行动中必然遵守的行为方式，以此来认识人类社会。”³¹显然，资本主义的崩溃并不包含在米塞斯的先验体系内。

人与外界的互动确实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不确定性是有限的，因为人的行动被某些相对固定不变的关系制约着。通过经验研究，现代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乃至政治学、国际关系学，都已经得出了人类行为的许多经验规律。人类所获得的经验是来源于实践的。在实践中，人与自然的互动要受客观世界的限制，人与他人的互动也是如此，因为人的观念的表达与领会也要为客观世界所限。并且，用以处理经验事实的认知结构也是在实践中发展的³²。总之，人的观念是被人在客观世界的实践限制在一定范围

²⁷ F.哈耶克，《知识的僭妄——哈耶克哲学、社会科学论文集》，邓正来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p. 9, p. 23.

²⁸ 《马克思致斐·多·纽文胡斯（1881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p. 643.

²⁹ L.米塞斯，《理论与历史：对社会经济演化的一种解释》，郑适萌等译，2014，p. 83.

³⁰ L.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梁小民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英文版序言，p. 2.

³¹ L.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上册，余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p. 30-81. 米塞斯对统计学、心理学的讨论参见：《理论与历史：对社会经济演化的一种解释》，p. 33, 35, 99, 101-102. 米塞斯认为，在人之行动的领域中，历史经验不能用以堆砌理论大厦，也不能据以预测事物，只有其建立在人之行动的公理上的先验理论才能做到这一点。罗斯巴德等许多奥地利学派的学者都接受了他的观点，参见：Randall Holcombe 编，《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李扬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p. 209-210.

³² 参见：福尔迈，《进化认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转引自：王生升，《哈耶克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与市场经济秩序》，中

内的。人类思维中再天马行空的想象，也无法摆脱客观世界的束缚。尽管人的观念可以千差万别，一旦要运用到实践中，也要为客观世界所限制，不合实际的实践不可持续。因此，人与外界互动的变化范围是有限的，我们是可以从这些互动的经验中总结出规律的。

较之于米塞斯的认识论，哈耶克与波普尔的观点或许更有可取之处。与米塞斯不同，哈耶克说：“对人的计划可以运用先验的逻辑体系进行分析，而当人们试图了解他人的行为时，就出现了经验因素。”哈耶克认为，有关社会的理论能够描述某些条件下将会出现的各种模式，而且这一预测也是可验证的，即经验性的，但不可能对特定现象作出具体预测，因为影响具体情况的条件太复杂。³³与哈耶克的观点类似，波普尔也认为：历史研究无法发现“规律”，更准确地说，无法发现一种“无原始条件”的“发展规律”，“历史决定论”的错误就在于提出“无条件的预言”而非“有条件的科学预测”。一个明确了充分条件的“趋势”才是真正有预测能力的“规律”。³⁴

这些批评提示我们，我们要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只是说阶级斗争在历史进程中十分重要，我们在审视历史运动时要善于运用阶级分析的视角，或许会发现阶级斗争在某事件中的作用，但并不是说在一切历史事件中都有阶级斗争的因素。它是一个视角，而不是一个命题、一个理论。

不过，回过头来看，马克思的理论真的如波普尔等人所说，是“无条件的预言”么？举例而言，波普尔认为马克思主张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包含着这样的条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张力愈发增强，无法消除，从而导致革命。然而，马克思忽视了他所依赖的条件是会变化的：“无约束的资本主义已经一去不复返。自马克思的时代以来，民主的干预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改进的劳动生产率——资本积累的结果——实质上使消除苦难成为可能。”³⁵只不过，波普尔引以为论据的干预主义，在米塞斯、哈耶克那里，却是要坚决予以拒斥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与奥地利学派达成了一致：干预主义没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换言之，如果我们坚持对马克思的理论所基于的条件予以检验，那么实质上我们与波普尔的认识论并不相悖。那么接下来的关键，就是从对现实经验的分析中理解和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国人民大学，2002，p. 55.

³³ 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p. 115.，Stephen Kresge 等编，《海耶克論海耶克：對話式自傳》，李華夏等譯，遠流出版公司，1999，p. 81-83. 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p. 510-511.

³⁴ 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p. 168-169.

³⁵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p. 291-292.

五. 衍生理论

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史/思想史上处于一个什么地位？

关于这个问题，依旧有许多流行的误解。

“官方化”的误解，将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唯一正确、不容辩驳的“绝对真理”。这种论断宣扬一种僵化的线性历史观，从逻辑上肯定现在的前进方向，并宣称自己在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地，官方话语体系与所谓“西方价值观”彻底对立起来，以压制反对者；为了营造对立，甚至不惜从帝王专制时代寻求帮助，宣扬“忠诚”“孝顺”的奴性文化。这一话语体系的最终目的，就是为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造成的一系列矛盾寻找辩护辞，并压制所有对这些矛盾进行批评的声音。这看起来很矛盾：“马克思主义”怎么是为资本主义辩护呢？然而，这种吊诡的情况恰恰就在中国发生了。限于篇幅，某些相关的论述需要在本辑材料的《现实》部分才能展开，这里仅在附记部分勾勒一个大致的框架。

“民间化”的误解，则是影响更为深远的一种。这种误解有各种各样的出发点，但概括起来，理由往往是“阶级斗争过时”“宣扬暴力”“灭绝人性”（或稍微温和点的说法：“空想成分太重，看不到人性本善/人性本恶”）等等。宣扬这种说法，或是借此来攻击社会主义者主导的、违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范的社会运动；或是单纯地出于对某些政党不满，而反对被这些政党引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借用一些西方理论论著中的说法，应当区分马克思主义本身和某些政党为了谋求权力而歪曲的“马克思主义”³⁶。

当然，这一节的主题并不是详细剖析这些误解；第一种误解留给附记，而前两节对基本原理的概述，就已经驳斥了第二种误解。这里只作一句总结：马克思主义者不妨承认保守主义者扣上的“灭绝人性”这个罪状，但如此一来，近现代许多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如尼采、弗洛伊德、列维-斯特劳斯、福柯、拉康、德里达——几乎都要戴上这个罪状。保守主义者何不连这些思想家也一并打倒，建立一个人人没有批判力的干净的世界？

现在就来简单梳理一下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史、思想史上的影响。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题目，足以支撑不同领域的学者写出多本专著，因此，这里的梳理必定是挂一漏万的。读者如果对此有兴趣，还是应当将这里的论述仅仅当成抛砖引玉。

从1920年代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新的思潮就在缓慢地孕育着，终于在卢卡奇·捷尔吉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这些新的思潮都否认了被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固定的经济决定论阐释：前者重视人的主体能动性对社会的影响，后者重视意识形态对社会结构的塑造。结合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现，这些思潮终于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

卢卡奇·捷尔吉是匈牙利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也是声誉卓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他主导了文艺批评理论界那场著名的“现实主义论战”，而他的文集《历史与阶级意识》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在这本文集中，卢卡奇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横行于左翼知识界的教条主义观点，并提出总体性的主-客体统一辩证法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即**人类社会的演进并不是靠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抽象演进，而是靠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推动的，在这个过程中才可以谈论人类活动及其产物之间的辩证特性**。这本文集的贡献还不止于此。它收录了文章《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这篇文章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的开端。在这篇文章中，卢卡奇总结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现象。他从《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的概念出发，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化”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他进一步对物化现象作出了总结，**将基于可计算性的合理化归为物化现象的重要原则，并提出物化的这一原则割裂了社会的整体图景，让劳动者沦为原子化的机器**。他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必须对抗这种物化意识形态，看到社会的整体图景，这是形成无产阶级意识的关键一步。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现之前发表的。马克思的手稿刚刚被发现，知识界就立刻注意到了《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同异化理论之间的平行之处。由此可以看出卢卡奇惊人的洞察力。卢卡奇的理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³⁶ 见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p. 759.

法兰克福学派一般用来指代马克斯·霍克海默创立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这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社会学研究所。由于研究所成员多为犹太人，故在纳粹上台后，研究所不得不流亡海外。从这时起，法兰克福学派开始在思想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不仅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潮，而且它的背后还有一长串声名显赫的名字：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赫伯特·马尔库塞、瓦尔特·本雅明……它还让人联想到 60 年代的学运、“现实主义论战”，以及文化批评、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犹太人、第三帝国和魏玛时期的德国。“法兰克福”的名字曾经是一个神话，后来它又落回了地面，但无论如何，法兰克福学派在 20 世纪的学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且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日。

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范式，是关于社会一般进程的“唯物主义的批判理论”。其典型特征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将精神分析、叔本华、尼采、克拉格斯的理性批判和形而上学批判的某些思想系统地融入历史唯物主义中。**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就现在所讨论的“法兰克福学派”而言，并没有一个统一范式可以概括其全部要素³⁷。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学派的两个领军人物。在霍克海默的指导下，社会研究所的方针是发展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虽然他的立场在一段时间内有相当大的变化，但是他至少突出了他的方案中的三个要素。**第一，突出了一种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思想，他认为这种批判在结构上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批判相似；第二，强调了通过学科之间的研究来重建各门学科的必要性；第三，强调了实践在对理论进行最终检验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在实践中必须坚持批判的要求，即“对社会进行自觉的有力的批判”。

霍克海默的最主要成果如下：为批判理论奠定哲学基础，并对经验论和实证论进行批判（《理性的失色》）；对工具主义理性的起源和本质进行分析，借以论证**“启蒙走向自我毁灭”**的辩证法命题（与阿多诺合作《启蒙辩证法》）；阐释现代文化的商品化特质（《批判理论》）；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出发，对极权主义的形成作出探索（《犹太人与欧洲》）；以及对当代的文化和政治所作的大量的评论。阿多诺的著述则惊人地横跨了许多领域，包括哲学、社会学、心理学、音乐研究和文化批判。在他的成果中，包含着对所有哲学基本原理的挑战性的批判，也包含着一种独特的唯物主义和辩证的方法。这其中对工具理性的起源和本质的分析（《启蒙辩证法》），有关于美学哲学的论著（《否定的辩证法》），还有许多关于文化的独创性的研究，以及对现代消遣娱乐产业的论述（《文化工业的再思考》）。总体来讲，**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文化工业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文化工业不过是对大众所作的欺骗，商品化的文化产品生产虚**的“个性”，从而掩盖了社会的现实。

弗洛姆的思想深受弗洛伊德理论影响。他也是“精神分析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有《逃避自由》《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等数种著作。**他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分析，**解释了阶级社会的稳定性，同时也悲观地暗示了其难以动摇的特性：阶级社会的权力结构为服从者复制了婴儿期的情境，使他们认为他们的统治者是有权力的、强大的、可敬的；与其反抗，不如用“爱”和“服从”换取统治者的保护和善意。关于神的观念使得人们（甚至是成年人）产生了自愿服从父亲，并理想化地看待统治者的心理。**弗洛姆用这一理论解释极权主义的起源，并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追求人类最高自由与解放的学说。**

本雅明是在阿多诺的介绍下进入研究所的，他在研究所的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理论文章是《法国作家的目前社会状况》。他替研究所完成其它作品，则大都跟他以形象的方式、即所谓“连拱廊式”复合结构的方式来阐述的法国 19 世纪思想意识形态史有关。其中包括著名的《机械再生产时代的艺术作品》，它阐明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艺术”是不能跟它的技术和社会阶级环境分割开来的；他富有创建性地提出这样的观点：**现代技术进入艺术领域后，将艺术从“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中解放出来，重新将其建立在政治实践的根基之上。**本雅明这篇文章和论爱德华·富克斯一文中对技术理论所作的发展，对于了解他所理解的关于思想和文化没有独立的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很关键的。他所写的关于波德莱尔的两篇文章，则把他对阶级、技术和文化的理解融为一体，对法西斯主义和一般的反动意识形态进行比较广泛的批判。

马尔库塞是学派的中坚人物，也是 60 年代学运和新左派运动的精神领袖。正因为他的后一种身份，法

³⁷ 可参考如下文献：《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中霍克海默、阿多诺、弗洛姆、本雅明、马尔库塞的条目；《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罗尔夫·魏格豪斯著。

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和批判理论才开始广泛流行（以至于学派被抬高成为一种神话）。马尔库塞的理论结合了弗洛伊德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同时贯彻着一种人文主义精神。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是“单向度”的新式极权主义社会，它通过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驯服社会成员，而造就出整合、容纳所有社会力量的可能前提。在这里技术统治取代政治统治，并且把政治、经济、艺术、哲学与日常思维等领域的一切批判和反对的向度吸收同化了，所有人都丧失了反抗的力量。马尔库塞主张“非暴力反抗”的革命，其目标是以解放情欲和艺术来解除人的“异化”，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

安东尼奥·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在法西斯的统治下被捕入狱。在监狱中，葛兰西坚持思考与写作，写下了 32 本《狱中札记》。这些札记成为了二十世纪意大利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作品。在这些札记中，葛兰西提出了对整个哲学界和政治学界都产生了奠基性影响力的“文化霸权”或“文化领导权”概念。在这里，“霸权”不是指暴力机器，而是一种维护现状的意识形态，它深深地根植在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中。它对人们进行统治的方式不是强迫，而是同意，即让人们都主动地接受它的规则。葛兰西提出，在成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仅仅靠摧毁国家机器不能够达到目的，因为文化霸权的存在使得市民社会这一深层结构无法受到触动。因而，必须要依靠知识分子进行“文化阵地战”，夺取文化领导权。葛兰西的理论是意识形态与霸权研究的开端。后来的路易·阿尔都塞等思想家都从葛兰西这里汲取了许多养分。

路易·阿尔都塞的理论常常被称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但这个提法并不十分准确。阿尔都塞的成名文集《保卫马克思》的核心，是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思想之间存在一个“认识论的断裂”，马克思从青年时代的人道主义转变为老年时代的科学主义，研究范式从以人的本质为核心转变成以社会结构的发展为核心。阿尔都塞将历史解读为“多元决定的无主体过程”，进而事实上反驳了经济决定论，也否认人的“自由自觉”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作用。他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则是对否认“自由自觉”的一个理论补充。在这里，他承接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套依靠表演（特定的仪式，如集会、祷告等）传唤人的主体的机器，在这个过程中，人受到规训。然而，意识形态本身却也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产物，它必然在生产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不断地生成。强调人的思想与行动受到语言、心理结构（如无意识）、社会生产方式等多种“外在”的结构所左右以至于决定，这正是最早的结构主义学者们的理论图景。然而，这些制约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客观结构却不是静止不动的，结构受到人的实践作用的推动而不断地变化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图景。阿尔都塞处在两者的相遇点上，他认为，尽管是人的实践活动在决定着这些结构，并推动着它们的变化，这种变化却不是个人的主观意愿所能左右的，结构对个人的影响以制约和规训为主。强调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特性，是阿尔都塞不同于早期结构主义学者的地方（他们往往把结构视作永恒而非历史的现象）。他处在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过渡的节点上。

应当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后结构主义思潮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端。法国思想界将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并称为“三个怀疑大师”，是因为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视角，极大地挑战了许多根深蒂固的固有观念。尼采宣告上帝之死，弗洛伊德宣告无意识的力量，马克思则宣告人类与自己的造物之间存在从不停息的纠缠。马克思道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共产党宣言》）。这种洞察力以极其强大的解构力量，消解了诸种被认为是一成不变的、永恒和神圣的观念，而将它们都视为是不断生成的历史性的，并直指它们背后所掩盖的压迫与矛盾。

后结构主义思潮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构力量。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学者都明确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吉尔·德勒兹和阿尔·巴迪欧等更是明确地拥抱了马克思主义。例如，德勒兹在反驳精神分析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命题时，就是指出这一命题的历史性；俄狄浦斯情结理论，将诞生于私有制的专偶制家庭看成了普遍存在的心理结构。德勒兹借助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在实践中不断生成”的理论，构建了一套激进的后结构主义哲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后结构主义应用于性社会学研究中，便开启了酷儿理论。这一理论诞生于 LGBT 运动，它解构了传统认知中的男/女性别划分与异性恋/同性性取向划分，进而为 LGBT 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酷儿理论的诸多先驱，如莫妮卡·威蒂格和朱迪斯·巴特勒等等都论述了性别/性向身份建构的历史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解构了“性别天生”等等根深蒂固的偏见，又在现实层面面向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靠拢，认为对女性和 LGBT 群体受到压迫的分析必须有政治经济学的向度，它们不仅仅是文化上或意识形态上的问题。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之后，还存在着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这一思潮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延伸，其代表人物包括对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作出修正的厄尼斯特·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提出景观社会理论的居伊·德波、提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让·鲍德里亚等等。之所以称为后-马克思主义，是因为这些理论家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分析意识形态问题和文化问题得到的部分结论，同时却改造、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分析范式，而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反面。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发展，对于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问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是思想史上一个影响力极大的流派，它的衍生思想以底色的方式存在于整个左翼知识界、文化界。

六. 附记：当代中国官方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依旧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世界最大的执政党——的官方话语，这一现实是必须正视的。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的现实情况稍作梳理。限于篇幅，这里只给出粗线条的结论。

首先需要确认三个基本结论：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到 70 年代末市场经济改革之前的这三十年时间里，从国家的建设方针来看，中国社会确实是**社会主义的**，但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被官僚主义腐蚀，没有做到民主管理、分配公平，也没有消灭资本主义因素。从当下的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来看，中国现在的社会性质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官僚资本主义**，但官僚集团控制资本的手段并不一定是直接成为资本家，更包括通过手中的权力建立依附于人情关系网（亲友）的政-商裙带关系。从国际地位来看，中国早已摆脱半殖民地命运，而跻身于半核心地位的、在国际资本主义秩序中有相当话语权的准帝国主义国家。

第二个结论显然与官方宣传完全不符。但要注意，**分析一个社会的形态，不能看执政者是如何写作宪法的，而要看真实的生产关系**。另外，中国的官僚集团与中国共产党远非完全重合：一方面，党内有许多仅掌握小部分政治权力的基层党员；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改革中，也不乏因善于经商而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非党员。中国共产党还吸收了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保守倾向的小资产阶级有助于维护政权稳定。

社会主义时期和市场经济改革时期决非对立。概括起来，**社会主义时期的建设对市场经济改革有四大决定性的贡献**：建设了完整的经济体系，保证市场经济改革时期资本可以（通过变卖国有资产的方式）快速积累；培养了一大批有一定劳动技能的劳动者，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充足的劳动力保障；建设了完善的官僚体系，使得中国资本得以依靠威权主义的运作方式镇压劳工阶级而迅速扩张，跻身后-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资本主义秩序；形成了一套国家主义的叙事话语，对普通劳动者形成规训，促使个人权益让位于国家的发展。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想要卖，也得有得卖！”

基于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是服务于国家主义叙事的意识形态规训，而彻底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分析范式的批判性**。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庸俗化为历史五阶段论，为市场经济改革时代寻求合法性。意识形态机构则将自己与马克思主义捆绑起来，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威权统治，并无原则地加以吹捧，为自己当前的威权主义执政方式寻求合法性。进一步地，意识形态机构把自己的官方意识形态与“西方价值观”完全对立起来。“西方价值观”中隐含着中国社会最急迫的诉求（平等与自由），所以为了压制反抗，意识形态机构便将这些话语都归为“西方的阴谋”，而鼓吹顺从、“忠诚”和“爱国”，以镇压反抗行为，并打消人们对自己统治的疑虑。

这种做法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时期建设的国家机器能够稳定存在，故而在意识形态话语上不能出现太大的断裂。然而话语的连贯不能掩盖内核的断裂。80 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就是最好的例子。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结论是：**风波的实质是官僚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工人阶级的镇压**。针对资本积累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不同的阶级给出不同的解决办法，但反对的都是同一套政-商裙带关系。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希望借助西方民主制度保证市场的公平和政府的廉洁，工人阶级则反对资本主义，希望恢复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制度。这些诉求都包含民主的成分，尽管“民主”一词的含义在两种表达中完全相反。然而，为了在镇压反对者的活动中保持话语的连贯性，官僚资产阶级却将全部批评都定性为“反社会主义”而加以镇压。正是这次镇压，巩固了威权统治，使大规模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行动趋于消亡，保证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得以继续快速发展。在这个实例面前，自由资本主义的基本信条不攻自破：在后-帝国主义时代，基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不可能跻身这个既成的秩序，威权手段是必要、甚至本质的。

官僚掌控的资本主义依旧是资本主义，不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这可以解释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公民权遭到压缩、弱势群体遭受歧视，等等。官方“马克思主义”近年不断地与保守主义话语相融合——如“优秀的传统文化”，女性“天职”、对上级的“忠诚”——也可以解释为官方为了缓和这些矛盾而制造的规训手段。

然而，官方的宣传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极端对立的（官僚资本主义 VS 社会主义，一党专政 VS 工人民主，国家主义 VS 国际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内部又天然蕴含了中国社会最急迫的诉求（平等与自由），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事实上是针对中国官僚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最有力的武器。

第三章 价值理论

本章将承接第二章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论述，回答第一章提出的问题：剩余价值理论的根基是什么？我们首先将指出价值这一概念在马克思这里的含义：它体现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除了讨论价值的实质，我们还将论述价值量的计算问题。随后，我们会对主流经济学回避价值理论的做法以及奥地利学派的效用价值理论作出回应。最后，我们会简要论述价值理论与资本主义危机之间的联系，并引出第五章对世界体系理论的讨论。

一、价值是社会关系的体现³⁸

商品生产并不是普遍的、必然的经济生活形式。它依然是一种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形式，我们必须注意**构成商品生产的基础的社会关系性质**。在交换价值问题上，既有产品数量关系；又有马克思首先发现的另一种关系，即隐藏在数量关系背后的一种特定的，由历史条件决定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前一种分析为价值量问题，后一种分析为价值质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创见，在于他意识到了历史政治发展与经济社会关系的关联，并进一步意识到在商品生产与交换中除了人与物的关系还包含有社会关系，从而构建了一个概念体系加以讨论，使其更为清晰明了。

商品的唯一特征，表现为彼此有交换价值。交换关系本身表明一个事实，即各个生产者虽然是在孤立的状态下进行工作，实际上却是在相互效劳。他们的劳动有一种社会的性质。商品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而这些人所处的社会，则是一个以分工为基础、生产者各自独立进行劳动的社会。

交换价值表明商品之间的一种关系。而对于单个商品而言，它就拥有一种属性，这种属性以数量的方式，在交换价值中显现出来。因而，一个商品，就被马克思简单地称为一个“价值”。

作为价值，商品是某种特定的、历史的社会形式的一个特征，这个社会形式具备两个突出的标志：（1）发达的分工，（2）私人的生产。必须认识，正是这个对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的分析，而不是什么主观成见或伦理原则，使马克思把劳动看作是价值的实体。

如果我们历史地、社会地看商品生产，它产生的历史前提，就是出现一个分工发达、私人占有的社会。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必须进行交换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以至于**为了交换，人们必须耗费劳动生产商品**。

因此，在商品生产社会，商品的社会属性、本质特征，就是凝结了社会性劳动。所谓社会性劳动，在此时，就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的劳动**，它体现了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关系——我付出这么多劳动，是为了与对方交换。而如果劳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最后产品出现了富余，因而拿去交换，这种交换关系就不是我们说的商品生产社会的交换关系。

抽象地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换关系中，排除了亲缘、等级等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对等关系，交换者地位相当。**所交换的商品的社会属性，也要体现这一对等的社会关系**，因而它们所凝结的社会性劳动也是对等的。

这里的劳动，能够相互比较的劳动，只能是抽象劳动，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马克思就将其称之为价值。

等价交换就是对平等的交换关系的反映。价值，就是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的社会关系的体现。

商品作为使用价值，与各种具体的有用劳动相对应，而商品作为价值，则与抽象劳动相对应。“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抛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生产活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

³⁹ 当马克思说劳动是价值的实体时，他所指的总是作抽象劳动解释的劳动。

³⁸ 本节内容参照：P.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2013，p. 44-65.

³⁹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中共中央编译局1963年版，p. 57.

所有商品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价值，这就是说，它们各自吸收了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它们都是抽象劳动的体现。价值量理论首先要研究的就是，在一个商品生产社会中，究竟有什么规律制约着劳动在各个不同生产领域间的配置。我们在下一节就会讨论价值量的问题。

我们对商品的分析，已经使我们从交换价值身上看出这就是在一定的分工制度下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从个人劳动身上看出这就是社会总劳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通过某种对商品生产的批判性分析，即透过表象分析它下面的人与人关系，我们才能看清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相对性。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将会揭示这一点。

需要强调的是，价格与价值是不同层次的两个概念，价值本来就未必直接对应价格，拿价格与价值的偏离来否定价值的存在是不成立的。在第一卷的抽象程度上，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在考虑了利润率平均化趋势的第三卷，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如果出现供求完全失衡的情况（如古董），价格还可能长期处于偏离价值的状态。考虑了供求等因素的影响后，劳动价值论可以对市场价格作出解释，但劳动价值论的最独特意义还是在于其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社会关系。

二、价值量问题

关于价值量问题，一言以蔽之，即商品的价值等于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价值”问题研究的是有什么意义，它与价格的关系是什么，在上一节“价值质问题”中已经讨论过了。本节将主要参考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的脉络，也参考其他文献，探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劳动价值论的实现方式，以及斯威齐针对劳动价值论的批评所作的一些回应。当然，这些回应不能完全覆盖对劳动价值论的诸多质疑。尚未顾及到的部分，将在下一节中进行补充。

第一步，把劳动用于生产，把物品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这在每个社会中——从最原始的社会到最发达的社会——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历史的进程中，发生变化的，是这些生产和分配活动的组织和贯彻执行方式。如马克思所说：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绝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41页）

因此，交换价值是商品生产社会中制约着生产活动配置的规律的一个方面。用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的措辞，来显示这种生产方式的含义，这是前面一章所讨论的价值质理论的任务。用量的说法来显示这些规律的性质，则是价值量理论的任务。因此，对交换价值本身的研究，仅仅是经济学的开端，而不是最终目的。

商品具有两个性质：按一定比例相互交换；从社会上可利用的总劳动力吸收了某个定量（以时间单位衡量）。最为初次近似，马克思假定，在交换比率和劳动时间比率之间有精确的对应关系。实践中发生的背离，只要不是过于夸张，可以在随后向现实接近的过程中加以处理。

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对劳动价值论有一个常见的误解，即“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但劳动价值论的真正含义是，决定价值的仅仅是“社会必要”的劳动，即在现存社会条件下必要的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 23 卷，第 52 页）。应注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仅同所完成的劳动数量有关，而丝毫不涉及使用价值或效用。

第二，比平均的（或“简单的”）劳动更为熟练的劳动，应该具有较大的价值生产能力。“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一个小时的简单劳动和一个小时的任何复杂劳动，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可以从它们在一个小时内所生产的产品比较价值中看得出来。当然，这并不是说两种类型的劳动其关系就是**取决于其产品的比较价值**。如果这样讲，那就会是循环论证。这两种类型的劳动，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是可以脱离其产品的市场价值而加以衡量的**。（事实上，我国各高校经管学院对劳动价值论的反驳之一，便是出于“两种类型的劳动取决于其产品的比较价值”这样的误解。这样的反驳其实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的无知。比较价值，只是测量方法之一，而非它的定义。）

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一种常见的批评。现实中价格不等于价值，价格决定于供求，而非劳动时间。下面我们会对这个批评作出回应。

接下来，我们将阐释供求决定价格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亚当·斯密的著名的鹿与海狸的例子——这个例子李嘉图也曾经用过——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起点。

“无资本储蓄亦无土地私有制度的初级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必要的各种劳动量之间的比例，就是这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例如，狩猎民族杀海狸一头，所需劳动，若二倍于杀野鹿一头所需，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通例，二日劳动生产物的价值，当然二倍于一日劳动的劳动生产物；两点钟劳动生产物的价值，当然二倍于一点钟劳动生产物。”（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第 55 页）

亚当·斯密的猎人，就是马克思所谓简单商品生产者，他们各以自由的比较简陋的武器，在对谁都开放的森林中进行狩猎，并把他的剩余猎物和其他猎人的产物相交换，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鹿和海狸会按照捕杀时所需时间数量比例相交换呢？亚当·斯密视为当然的事情，是容易补做证明的。

一个猎人划伤自己的两个钟头的时间，可以得到一头海狸或是二头鹿。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下，“在市面上”，一头海狸换一头鹿。在这种情况下，谁去捕猎海狸，谁就是傻瓜。因为，在一个钟头内，可以猎取一头鹿，然后通过交换，就可以得到一头海狸；而直接搞一头海狸，却需要两个钟头。所以，这种局面是不稳定的，也是不能持久的。鹿的供应会扩大，而海狸的供应则会缩减，直到除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上市，且也找不到鹿的买主。照此推理，用排他法就可以证明，只有一个交换率，即一头海狸换二头鹿可以构成稳定的局面。当市场上保持着这个比率的时候，捕猎海狸的人既无意于改行捕鹿，而猎鹿的人也无意于改行捕捉海狸。所以，这是均衡的交换比率。一头海狸的价值就是良透露，反之亦然。

要得到这个结果，必须有两个暗含的假定，这就是，猎人有随意由捕鹿转变为捕海狸的准备，只要这样做可以改善他自己的处境的话；同时，没有什么东西阻碍这种改变。换句话说，猎人们必须是既愿意而又可能把他们的劳动从这一行转到那一行，借以自由地争得交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任何好处。假定这就是简单商品生产社会里的竞争，那么，只有当每个商品的价格同该商品生产时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成比例时，供给与需求才会达到平衡。掉个头来说，只有在供求的竞争力量得以自由地发生作用时，和劳动时间成比例的价格才会成立。所以，**关于价格决定的竞争性供求理论，不但同劳动理论没有分歧，它反倒成为劳动理论的一个主要的——即使有时候是未被人承认的——组成部分**。

常常有人指责马克思，说他忽视了需求——意即消费者的需要与欲望——在决定价值量关系上的作用。只要讨论是有限于简单商品生产社会里的交换比例——如像亚当·斯密的猎人——这个问题是无关重要的，因为在这些条件下，消费者的欲望是什么样子，在均衡价值的决定中是不起作用的。如果海狸和鹿都有用处——“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54 页）——它们就必须按各自的劳动时间的比例来交换，而不管每一方的相对欲望强度如何。

不过，如果我们不只是考虑单纯的交换率问题，而把眼光放在社会劳动力在一个商品生产者社会的各种不同生产领域之间如何进行数量配置的方面时，对消费者的需求就不能加以忽视了。例如，假定海狸仅用来制作皮帽，而鹿却是社会的基本食物，那么用在猎鹿方面的劳动就要比捕猎海狸的劳动多得多。因此，如果要想既知交换的比率又知劳动的分配，那就必须有两种信息：第一，关于海狸和鹿的比较劳动成本的信息；第二，关于海狸和鹿的比较需求强度的信息。已知这两种信息，那就有可能决定，在该社会中，可以称之为一般经济均衡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它是一种“均衡”，因为它规定，在基本条件不起任何变化的情况下，什么事态将会继续存在下去；他又是“一般”，因为不仅海狸和鹿的比较价值定了下来，而且海狸和鹿的产量以及社会劳动力的分配也定了下来。

当价值量理论的任务是按照这个广泛的意义来考虑的时候，消费者的欲望格局，就不能置之不顾了。但是，正是在这一点上，以忽视需求为由来责难马克思，就站不住脚了。相反的印象，看来是如此普遍，所以从《资本论》第三卷中引上一大段，可能是恰当的。

“如果这种分工是按比例进行的，那末，不同类产品就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或按照这样一种价格出售，这种价格是由一般规律决定的这些价值……的变形。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末，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例如，棉织品按比例来说生产过多了，虽然在这个棉织品总产品中只体现了一定条件下为生产这个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但是，总的来说，这个特殊部门消耗的社会劳动已经过多；就是说，产品的一部分已经没有用处。因此，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在这里界限是通过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社会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只能把它的总劳动时间中这样多的劳动时间用在这样一种产品上。”（《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七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716-717 页。又见第 198 页、215 页。）

如果马克思是这么清楚地认识到需求在决定社会劳动配置方面所起的作用，那么，人们大可以发问，为什么就他的整个理论体系而言，他是这么简单地、甚至可以说是偶然地看待这个因素呢；为什么他不沿着他的同时代人如杰文斯、瓦尔拉斯和门格尔等的路子，发展一个关于消费者选择的理论呢？马克思所以明显地抛开这个问题，有两个基本原因。

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效需求仅仅是部分地属于消费者的欲望问题**。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的基本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是生产关系的反映，或者说，是马克思所谓社会阶级结构的反映。市场需求受收入分配所支配——这至少就现代资本主义来说是难于否认的——这个命题如果为人们接受，那么，在这范围之内，似乎我们就不大能够逃出这样的结论，即与其通过消费者的主观评价，倒不如通过生产关系的思路来认识价值的问题。就像我们在前面一章所已经看到的，劳动理论的创立，是为了充分解释简单商品生产所特有的生产关系。

不过，但是这个理由，还不足以解释马克思对消费者欲望的轻视程度。因为，即使它们的重要性有限，但它们在决定社会生产力的配置方面，无疑的是发生作用的。这就应该对第二个因素加以考虑了。在《资本论》第一章中，马克思强调指出，他主要是对社会变革发生兴趣；更明确地说，他在《资本论》中研究“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从这个观点来看，任何东西，只要它本身相当稳定，并且仅仅是对别处的变动起反作用，那就不仅可能而且必须放在分析方案的次要位置上。显然，马克思认为，消费者欲望属于社

会生活中反作用因素的范畴。只要欲望不是出于基本生理需要，那么，就此而论，**它们便是社会的技术发展和组织发展的反映**，而不是相反。“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如果人们对社会经济变革有兴趣，并且承认主观因素在这个变革过程中基本上起着被动的作用，那就很难否认，马克思轻视消费者欲望的做法是正确的了。

附、价值与生产价格

有人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前后矛盾的，因为在资本论中第一卷中，价格等于价值；而在第三卷中，却出现了价格偏离价值、生产价格、利润率平均化等概念。

如果认为马克思的价值量理论全都包含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虽然这是人们所常犯的错误。回想那一章的标题就是“商品”，而它所大力强调的，也是我们称为价值质的问题。就价值量的问题来说，它所谋求的，不过是一种初次近似，这种初次近似就包含在商品各按其所体现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比例相互交换的命题之中。况且，就是关于这个初次近似，它所绝对适用的各种情况，也未予以研究。（事实上，在物理学中，这种近似也是一开始必不可少的步骤）可见，我们在《资本论》第一章中所看到的，只是价值量理论的第一步。其后的各个步骤，按照资本论的写作计划，是留待该书的后一阶段解决的。

而在马克思对生产价格的研究中（限于篇幅原因，这部分不会在本材料中涉及），我们可以看到，生产价格是根据某些通则从价值中派生出来的；两者的背离，既不是任意规定的，也不是无法解释的。因此，那个来自庞巴维克（《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特别是第三章，矛盾问题）以来就支配着英美两国批评马克思者的观点，即生产价格理论和价值理论相矛盾的观点，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生产价格理论非但没有和价值理论矛盾，它正是直接地建立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并且，除了作为价值理论的发展以外，不会有什么意义。

三、“价值”的概念是不必要的吗？

许多人会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引入价值的概念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从新古典经济学开始，经济学家已经放弃了对“价值”的讨论。他们直接从价格出发，发展出一套看似完善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他们声称，这便省去了对“从价值到价格的转换”过程。“价值”应该用“奥卡姆剃刀”去除。然而，对价值的讨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人们可能禁不住要进一步承认，从形式上看来，即使在分析整个制度的动态时，也可能把价值计算省去。但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使人相信，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全部社会产品都是人类劳动的结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个社会产品的一部分，被社会中拥有生产资料的那伙人所侵吞。这不是一个伦理的判断，而是对实际存在于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基本经济关系的一种描绘方法。他的最清晰的理论表达方式，就是剩余价值理论，只要我们保留价值计算，那么对于利润作为社会劳动产品的一种扣除的来源与性质，就不会含糊不清了。把货币范畴转化为社会范畴也就大为便利。总之，价值计算使人们可能透过货币和商品的表面现象，看出在它下面的人与人之间和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

反之，价格计算把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个根本的社会关系神秘化了。因为利润是被当作总资本的一种报酬来计算的，这就难免产生一种想法，认为资本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有“生产性”。财物似乎就被赋予了自我独立的力量。从价值计算的观点看来，不难认出，这是商品拜物教的一种丑恶形式。但从价格计算的观点看来，它却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不过，这还不仅是一个掩盖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社会关系的问题。每一种以价格计算为起点而引申出来的利润学说，都是容易受到严重责难的。马克思价值论的主要反对者庞巴维克就有力地摧毁了各种以所谓资本生产力作为论理依据的学说，他自己的时间偏好理论当然也是站

不住脚的。意味深长的也许是，现代理论家们大都已经放弃了对利润来源进行解释的打算，而只限于分析利润水平的变化和利润在企业主和食利者之间的分割。”（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

事实上，承认“劳动价值论”，从而讨论“价值”，那不可避免地会得出剩余价值，从而资本主义本身的合法性便得到质疑。但在这里，我们必须意识到，马克思讨论的“价值”，事实上讨论的是社会总劳动在各部门之间的分布。**而货币、价格、资本，拨开其神秘的面纱，其本身不过是一种分配方式，进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一种权力关系。**利息和利润，并不说明资本本身具有了某种生产性，它表现的只是食利者和借方之间、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存在某种权力关系。剩余价值率会随着阶级斗争的形势而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改变社会产品是由无产阶级劳动创造的事实。

还需要指出的是，剩余劳动在任何阶级社会都存在，而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才采取“剩余价值”的形式。

马克思说：“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可见，剩余劳动，即超出劳动者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劳动，以及这种剩余劳动的产品被别人占有，即对劳动的剥削，是到目前为止一切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社会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只有当这种剩余劳动的产品采取了剩余价值的形式，当生产资料所有者找到了自由的工人——不受社会束缚和没有自己的财产的工人——作为剥削对象，并且为生产商品而剥削工人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才具有资本的特殊性质。而这种情形只是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才大规模地出现。（恩格斯《反杜林论》）

四、奥地利学派效用价值论的观点及其推论⁴⁰

新古典经济学的萨缪尔森等人最终选择用价格论来代替价值论，回避了价值理论这一根本性的问题。这样一来，就只有奥地利学派的效用价值论能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产生直接而猛烈的碰撞了。因此，对其理论进行专门论述是十分必要的。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说的史前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到17世纪的西班牙经验哲学。从根源上说，奥地利学派实际上是西班牙学派。继中世纪经验哲学家之后，爱尔兰银行家坎蒂隆、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和萨伊、巴斯夏等，也对后来的奥地利学派产生了影响。当然，奥地利学派对他们的继承是批判性的。

比如，萨伊认为，价值的基础是效用，或者说是商务或服务满足人们欲望的能力。他在《政治经济学入门》中说：“创造效用的能力……使得生产性主体拥有价值。”然而，**在奥地利学派看来，萨伊的谬误在于坚持“等价交换”**，他认为市场价格是对物品经济价值正确且精确的衡量。这意味着人人不同的主观效用产生了一个人人相同的客观价值，其逻辑是不自洽的——一个人依据效用肯与另一个人交换，一定是认为对方商品的效用高过自己所持有的。⁴¹ 奥地利学派否定“等价交换”，这是符合其主观主义内在逻辑的。

门格尔是奥地利学派真正的创立者，他正式确立了边际效用法则。而庞巴维克继承了门格尔的衣钵，成为了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代领军者，他最引人注目的著作就是试图攻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资本与利息》和《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

路德维希·米塞斯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第三代的领军人物。他将效用价值论建立在“人的行动”理论上：行动人只要未受到强制，对当时的他而言，他所选择的行动一定是效用最大的，这种对效用的衡量是纯粹主观、因人而异的。他对门格尔等人的理论进行了修正，这也使奥地利学派与主流经济学分道扬镳：他反对对效用进行计量，否认主流经济学的“无差异曲线”等概念。

在其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米塞斯成功地发展了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在此之前，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被认为是陷入了一种循环论证：消费者通过自己的价值尺度对商品进行排序。商品对不同消费者的

⁴⁰ 本节内容参照了：Randall Holcombe 编，《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李扬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⁴¹ L. 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上册，余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p. 227。

效用相互作用，形成市场需求。市场的供应由预估的市场需求所决定，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决定市场价格。但这一理论在遇到货币时出了问题。货币也是一种商品，货币之所以有市场需求，不是为了存放货币本身，而是为了购买其他产品。货币不能直接消费，只能作为交换媒介。因此，只有当货币有着事先存在的购买力、价值或价格，市场才能产生对他的需求。这就导致了货币的价值尽管由需求决定，却出现于需求之前。比如，第 n 天的货币价值，由第 $n-1$ 天的货币价值决定，这种向过去的追溯永远不可能结束。

米塞斯认识到，这种追溯是有尽头的。货币在某个时刻前必然只是物物交换的商品。在某一时刻，这种商品尚不是货币，而在下一时刻，人们将其视作了货币，那么其货币价值就由前一时刻的商品价值决定，由其需求决定。这样以来，**货币的价值也就最终归结到了个人效用之上。**

米塞斯的分析是建立在个体行为之上的，他认为，和对其他经济问题一样（比如前文所述的效用问题），对货币问题不必研究全称实体，如货币总额、流通速度等⁴²。米塞斯反对以费雪为代表的货币数量论，因为这些理论以总量之间的关系为基础。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量增长不过使得物价水平提高了相应的百分比，不会影响相对价格。而米塞斯认为恰恰相反，增发货币是一种财富再分配，会改变个人的相对收入，改变其偏好，从而改变相对价格，产生错误的价格信号，使价格体系发生扭曲。当货币增发难以为继的时候，虚假的时间偏好所导致的虚高的需求就会原形毕露，造成衰退。

因此，“一旦货币的地位在市场上得以确立，就不需要人为增加货币供给。这意味着任意货币供应量都是‘最优的’，政府鼓动的货币增发可能带来危险后果。”这就造成了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货币主义学派这两个同为新自由主义阵营的经济学派的一大分歧。货币学派也认为，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是政府鼓动的货币增发，但在通货紧缩时，货币学派也主张增发货币，保持物价稳定，这是与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对立的。

米塞斯继续推论，**没有硬通货支撑的信用会扩大货币的供给并造成通货膨胀，所以应当实施金本位，并且确保银行的债务必须有 100% 的现金保障。**米塞斯相信，政府的中央银行不会有动力推行完全准备金制度，因此应当推行自由银行制度。个体银行很难有扩张信用的空间，因而不会引起通胀。其完全准备金的观点，与货币学派类似。

在货币理论的基础上，米塞斯又继续开创了商业周期理论：繁荣由货币增发所产生并推动，“创造”出的银行信用先是促进增长，后是被迫紧缩。由注入货币、压低利率所产生的虚高的银行信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市场中不良投资过剩，超过消费者需求。衰退的过程就是市场经济把繁荣时期造就的不良投资拆解并重构的过程。经济衰退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因此，**经济衰退的时候政府增发货币只会使得市场更为扭曲，政府应当停止对衰退的干涉。**同理，累进税制、价格管制与工会集体谈判同样会扭曲市场，最终导致大众的利益受损。继米塞斯之后，哈耶克、罗斯巴德等奥地利学派的领军者都接受了这类反对经济干预的观点。

在此，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抛开取消工会与最低工资制等不谈，奥地利学派主张的金本位、完全准备金和取消央行等制度，为什么没有被任何一个当今国家所实行呢？

米塞斯声称：“人类社会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因素：由杰出之士精心构建出来的健全的社会经济理论，以及他们或其他人士能够用这些意识形态说服大众的能力。”⁴³ 似乎，问题只能归咎于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们无力说服大众以及当政者实行他们的学说。

然而，米塞斯忽视了：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有什么动力实施他们主张的政策呢？当一个国家的资本积累已经高度依赖信贷扩张，回归金本位无异于让资本家自断生路。同样的道理，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为了应对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资产阶级国家必然选择改良主义的干涉政策，否则只能迎来工人运动的激进化。

米塞斯在反驳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时说：“错误的理论不可能比正确的理论更好地为一个人、一个阶级或整个人类服务。”⁴⁴ 然而事实恰恰是：米塞斯眼中的“正确理论”，就是因为有悖于资产阶级的自身利

⁴² 参见：L·米塞斯，《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戴忠玉等译，新星出版社，2007。

⁴³ L·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上册，p. 94。下册，p. 887。

⁴⁴ L·米塞斯，《理论与历史：对社会经济演化的一种解释》，郑适萌等译，2014，p. 48。

益，才得不到采纳。意识形态的变化往往是阶级利益、阶级关系的变化使然，这是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的原理。否认唯物主义的米塞斯无法认识到这一点，这便使奥地利学派的主张丧失了实践性——这正是他们所面临的最大困难。

另一方面，这一困难也源于米塞斯反对从历史经验材料中探寻出一定的客观规律并用以指导实践。众所周知，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大多是通过统计数据、案例访谈等途径获取经验资料，从中总结出规律。这些规律往往会告诉我们，社会结构中阶级地位的差异、文化的差异，以及社会总体间的差异等，会对人的行动有何种影响⁴⁵。

对于某种观念，社会中的有些人可能会由于其不能满足自身利益而不容易认同并实践它，但另一些人却有可能因为利益一致而趋向于认同并实践它。米塞斯的主观主义使其否定了经验研究，也就使其无法以此来发现人行动背后的社会总体结构的作用，其必然结果就是找不到实践的主体，从而丧失实践性。

以至于，除了归咎于自己的无能，奥地利学派甚至无法解释为何自己的学说得不到实践，也无法解释为何这样或那样的学说却能够发展壮大，落地开花。

五、劳动价值论与资本主义的危机

通过劳动价值论，我们得以审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从而能理解社会矛盾激化的可能性。首先要指出的是，只有“劳动耗费”才能体现劳动成果被资本占有的生产关系。我们下面讲论述这一点：

首先，“劳动耗费”指的是人类劳动的对象化，即凝结为一个物。这体现了物质生产意义上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区别，反映了物质产品在物质生产部门与非物质生产部门间的分配。服务部门是非生产性的，他们在分配中，占有了物质生产部门生产出来的，按劳动价值衡量的物质产品。⁴⁶

资本也是非生产性的——当然，真实的资本家的一部分管理劳动是具有生产性的，但我们现在所考察的是抽象的资本，它们只凭借所有权获得收入——因为“所有权”本身，不可能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耗费半点的劳动。它们只能凭借着所有权，在分配中占有其他人耗费的劳动。厂房、机器也不可能耗费劳动，它们只能转移出别人曾耗费在他们身上的劳动，因而绝不创造新的价值。

我们认为，服务部门对劳动价值的占有不属于剥削，因为这其中不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如果考虑到金融部门对产业部门的不平等关系，则另当别论）。而存在着**不平等权力关系**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则具有着**剥削性**。⁴⁷

经验事实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劳动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权力关系的运作过程⁴⁸。工人是否要在法定工作时间外加班，工人在劳动中要受到多大的管理压力、承受多大的强度，这些都是在市场交换时不会在契约上写明的，最终的状况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劳动者与资本的根本矛盾存在于生产过程，而不是看似平等自愿的市场交换过程中。如果有资本愿意提供更高的工资待遇，并使其超过增加一单位劳动力投入所能带来的市场收入⁴⁹，他的利润就会被压缩，从而在竞争中落败。除非，他的竞争对手们都收到同样的限制，而这样的规定在工人阶级没有团结起来抗争的国家是不存在的。

由此，我们也就能理解**资本主义矛盾激化背后的社会关系**：由于资本占有了工人全部的劳动成果，并仅支付给工人其中的一部分以恢复其劳动力（劳动力的价值），致使资本无偿占有了工人的剩余劳动。随着资本的积累与集中，少数人占有了越来越多的多数人的劳动，由此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拉大。而工人愈是持续地付出劳动，愈是使自己处于相对贫困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贫富差距激发了劳动者追求更好待遇的

⁴⁵ 参见：Bowles S., et al.《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孟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p. 35-43.

⁴⁶ 参见：王峰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当代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p. 102-125.

⁴⁷ 参见：王峰明，《历史唯物主义——一种微观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p. 258-259.

⁴⁸ 参见迈克尔·布洛维的“生产政治”理论：Burawoy M.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Verso, 1985.

⁴⁹ 这意味着该劳动力所创造的使用价值超出了当期市场的有效需求，使其创造的剩余价值无法实现。在资本家看来，最后一单位劳动力投入所能实现的价值，应是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否则，便意味着新增投入依然有可能实现剩余价值，他便会继续投入劳动力。所以，在工人抗争被压制的情况下，由市场所决定的工资便相当于（有时甚至会低于）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即再生产其劳动力（恢复体力脑力）所需的抽象劳动。

心理预期。而一旦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经济停滞、福利倒退（如下文所述，这也可以由劳动价值论解释），则将使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停滞乃至恶化，与其预期相违背。而为了实现自己的预期，劳动者往往已经耗费了许多劳动，付出了许多努力。这就容易使其将矛头指向外界环境，指向社会制度，从而导致矛盾的激化。

当然，对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还有更详细、复杂的分析，除了利润率下降理论（我们接下来将会提到）、消费不足理论，还有比例失衡理论、利润挤压理论，综合性的危机理论还有曼德尔的长波理论、美国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法国的调节学派理论、大卫·哈维的三层次危机理论等，我们将在进阶材料中详细介绍。

在此我们需要专门介绍的，是与世界体系理论结合起来的危机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在物质生产领域（不涉及不创造价值的服务业），技术进步的必然趋势是资本有机构成中不变资本（如机器设备等）的比重相对上升，而可变资本（劳动力）的比重相对下降，在剥削率不变的条件下（剥削率过高将激化阶级矛盾），由于剩余价值（利润）只由劳动创造，因此单位资本投入的利润率必然趋于下降。

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以便于理解：某个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技术突破，原需要长时间劳动的物质产品只需按一下按钮即可生产出来。当然，生产这样高效的机器还是需要较多劳动量的。然而，由于该产品的生产过程所需耗费的劳动较少，其在市场中所能换得的价值量相对于不变资本（对机器的预付投入）也较小，导致利润率也变得更低。如果不能加大对工人的剥削，或从其他国家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的投资积极性就会受损，现实经济就会陷入困境。

这时候，我们就必须看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不平等交换**。这一理论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阐述，简单地说：总有一部分产业由于其产品独特而存在一定的垄断性，拥有议价权；也总有一部分国家的产业之生产率较其他国家高，从而能获得超额利润。中心国家凭借占据的这些产业的地位，与外围国家进行不平等交换。

不难发现，中心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高端产业的超额利润⁵⁰，半外围、外围国家的经济增长则依赖于资本的扩张，依赖于吸纳越来越多的农村廉价劳动力⁵¹，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由于这些国家普遍拥有一个庞大而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因而其廉价劳动力的开发还有很大的潜力，然而这毕竟是有限度的。中国所谓“人口红利”的丧失，实质上就是遇到了这一困境。而部分已完成工业化的半外围国家，如南欧、南美各国，则将合法性建立在借债发福利的基础上，事实证明这也必然是难以为继的⁵²。

西方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指出，美国在 1850 年—1950 年间保持了长期意义上的利润率稳定⁵³。这似乎证伪了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然而结果恰恰相反。美国企业的营业收入包含了大量的对外贸易收入。美国这类中心国家与半外围、外围国家的交换，从劳动耗费的角度看，是不平等的。2000 年的数据显示，中心国家能够以 3 小时的劳动，交换外围国家 130 小时的劳动⁵⁴。**（半）外围国家的劳动价值被转移到了中心国家，维持了中心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工资福利。**1850 年—1950 年，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提高，其单位劳动时间能换来的他国劳动时间不断增加，使得单位资本转移的劳动价值量逐年增加，而美国又维持了长期的利润率稳定，可见其单位资本所雇佣的本国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量不断减少。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其真实利润率是愈发下降的。

但是，指出其利润率下降的事实有何意义呢？意义就在于揭示了中心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国际不平等交

⁵⁰ 美国的情况会更为特殊。因为美国更多地利用了金融霸权、政治军事霸权来强化不平等交换，从而维持了经济增长，而非仅仅是依赖于高端产业的超额利润。

⁵¹ 参见“刘易斯拐点”理论：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22(2):139-191.

⁵² 参见：陈帅宇. 欧债危机的成因、影响及启示. 经营管理者, 2012(13):49-50. 陈昌兵. “福利赶超”与“增长陷阱”. 经济评论, 2009(4):97-105.

⁵³ Kaldor 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Theory of Capital*.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61. 亦有经验研究指出，19 世纪中期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利润率有下降趋势，例如：李民琪，朱安东. 世界利润率长波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 海派经济学, 2006(4):26-41.

⁵⁴ 李民琪等, 《资本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p. 174.

换⁵⁵的依赖。据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帝国主义国家间何以有战争的危险。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近一段时期内至少要维持 6% 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产业升级”，实质就是通过提高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从半外围国家上升为中心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维持国内的经济增长。然而正如我们刚才所说，产业链的高端地位是有限的，否则就无以称为高端产业。如果一个高端产业由于技术进步而更容易被后继者进入，那么其竞争的扩大将削弱超额利润，从而使不平等交换、价值转移的效应削弱直至不复存在。既然高端产业是有限的，那么中国就必须完全取代发达国家在产业链上的现有地位，才能使一个 13 亿人口的大国成为中心国家⁵⁶。这种取代，不仅要考虑技术上的可能性，更要考虑国际政治上的可能性，中心国家不可能容忍这种取代的发生。因此，这即使拥有一定的可能，也是建立在可能使国际和平形势严重恶化的基础上的。

回到理论探讨中，曼德尔曾在《资本论》英译版的导言中这样论述资本主义的崩溃逻辑：自动化、金融化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周期性危机的市场波动强度增大，价值实现可能面临更大的困难；同时，资本之间的竞争一方面导致利润率的平均化，进而与技术革命共同导致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另一方面，资本趋向于集中，而垄断资本之间追求利润率的斗争将导致国内更高水平的阶级斗争与国际间更尖锐的斗争。⁵⁷

社会主义，还是野蛮？⁵⁸——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深刻地洞察现实世界的矛盾之后，对实践者们所提出的问题。

⁵⁵ 这是劳动价值意义上的不平等，而未必是市场交换意义上的。显然，美国会利用其军事金融霸权制造后一类意义上的不平等。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此类霸权的核心国家来说，其经济增长还是依赖于劳动价值意义上的不平等交换。

⁵⁶ 参见：“2000 年……中心地区一共获得了高达 8500 亿小时劳动的价值净转移……如果中国要按照与现在中心地区同样的比例剥削世界其它地区，中国就需要从不平等交换中获得 1.6 万亿劳动小时的剩余价值，而中国以外的外围地区目前所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不过 1 万亿劳动小时。”李民骐等，《资本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p. 174.

⁵⁷ 曼德尔，《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仇启华，杜章智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p. 150.

⁵⁸ 参见：罗莎·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Rosa-Luxemburg/Rosa-191604.htm>.

第四章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一、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⁵⁹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可以说是一种对全球进行“社会分层”的理论。沃勒斯坦认为，“世界性劳动分工创造了世界性商品链”，“商品链在空间分布上呈向心结构和等级化特征，正是向心性和等级化塑造了现代世界体系的‘极性’”，即“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

核心地区是集中生产核心产品的地区；边缘地区是主要生产边缘产品的地区；半边缘地区是既生产核心产品又生产边缘产品。

核心产品是由高工资工人生产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边缘产品是劳动密集型的，由低工资工人生产的产品，这些工人通常还承受着“超经济强制”——比如对工运的压制。显然，资本主义世界等级体系是以不平等的劳动分工为基础的。

沃勒斯坦认为，中心地区的资本积累率高，边缘地区的资本积累率则很低。这一结果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心地区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边缘地区；二是中心地区以工业生产为主，在商品生产链上居于高端地位，边缘和半边缘以原料和农产品为主。沃勒斯坦认为，这是世界体系的一个最基本特点：“这种组合使这个体系中的某些集团剥削其他一些集团的劳动（的能力），即获取较大份额的剩余的能力得到扩大并合法化。”他指出：“某一地区把所拥有的较不‘短缺’的货物‘卖给’另一地区，其售价比同等标价但朝相反方向流动的商品体现出更多的实际投入（成本），这样，总利润（或剩余）的一部分就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⁶⁰

第三个原因是不平等交换。其机制是：边缘地区工人的工资低于中心地区工人的工资，同时，边缘地区以低工资产品交换中心地区的高工资产品。这就构成了一种不等价的交换关系。在沃勒斯坦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之所以能持续运转，正是依赖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不平等交换使经济剩余从边缘持续地向中心转移，它增强了中心地区的竞争优势，并确保了体系结构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的结构是动态演进的”，由于“发展不平衡”这一规律，三个结构地带的变化可能存在三种主要趋势：第一、中心国家可能变成半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可能变成边缘国家。第二、边缘地区的某些发展了竞争优势的国家迅速崛起，上升为半边缘国家，继而成为中心国家。第三、半边缘地区存在着向上或向下运动的两种趋势，“如果它们发展出更有效率的制度与产权，那么就上升为中心国家，如果竞争失败或经济长期衰退，就下降为边缘国家”。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的发展动力是永无休止的资本积累。资本积累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产生的。现代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使全世界都被纳入到这个单一的劳动分工之中。“而世界体系的上层建筑，即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多元政治结构则保证了这个单一劳动分工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同时也保证了资本积累不被任何非资本主义力量所打破或终止。”

在沃勒斯坦看来，帝国主义是强国通过政治力量，直接地或间接地迫使弱国屈服，其目的在于改变世界市场的分配。直接方式是殖民主义，间接方式是“非正式帝国”，即“通过非殖民统治获得帝国的最大利益”。这种活动实质是中心对边缘的活动，既是一种经济活动，又是一种政治活动。⁶¹

⁵⁹ 本节如无额外说明，引号内容皆引自或转引自：张建新：大国崛起与世界体系变革——世界体系理论的视角，国际观察，2011年第2期。

⁶⁰ 周莹：三种范式还是一种范式？——评沃勒斯坦对帝国主义理论范式的批评与重构，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6期。

⁶¹ 周莹：三种范式还是一种范式？——评沃勒斯坦对帝国主义理论范式的批评与重构，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6期。

二、中国将在世界体系中如何发展？

当今的中国，无疑是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的一员。我们的问题是：未来的中国将如何在世界体系中发展？具体地说，就是中国是否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体系，从而改变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性质？还是说，仅仅是在原有体系下提高自己的地位，成为新的“中心”？又或者，连提高地位都做不到？

笔者认为，正如破土网撰稿人林岛所言：“国际关系只是国内关系的延伸，‘一带一路’能否成为‘具有 21 世纪社会主义特征的共同道路’，取决于中国社会内部能否超越‘经济过程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和摧毁’。”⁶²

张建新也说：“大国崛起并不必然导致世界体系性质的改变，即便一个新兴国家的力量足够强大，如果它必须依赖于现有劳动分工模式，并且根本不可能运行一种新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的劳动分工体系，那么这种力量充其量改变了其自身在世界经济体系上层建筑（即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它不会也不可能改变世界体系的性质。”⁶³

张昕更是道出了问题的本质：“这些问题，仅仅关注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是不够的，必须回到新兴经济体内部的阶级构成、国家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国家的政治属性，这些将是决定新兴经济未来对于国际治理影响的决定因素，也是今后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的领域。”⁶⁴

换句话说，中国能否（或者说，是否愿意）改变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取决于中国国内能否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必须是能够超越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决于中国国内的社会经济形势、阶级关系以及国家的政治属性。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转型能否成功，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我们没有理由盲目自信地认为中国的经济形势必然始终向好。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制造业疲软已是事实，风险依然存在。国有企业与强有力的政府调控——这被标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并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因素所导致的生产过剩、资本过剩、利润率下降和市场失灵，至多能有所限制，而且有时候乱干预还可能恶化局势。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想要找到新的稳固增长点，就必须要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找到一个新的优势位置。否则，“新常态”的中高速增长就很难维持。而一旦经济失速，就业、工资、福利等民生问题就必然会受到影响，国内阶级矛盾很可能就由此激化，暴恐事件也有可能增多。毕竟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社会承受着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却没有激化矛盾，很大程度上就是经济高速增长带来涓滴效应的结果。

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的执政者无疑就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触动资产者的利益，通过再分配其财富，乃至重新掌握生产资料，博得劳动者的支持；要么拒绝触动，宁肯不顾社会主义的旗号，镇压人民——“要么社会主义，要么野蛮”。我相信，执政党要推行这两个方案中的任何一个，都必然是要受到极大的阻碍的。后者自不必说，前者显然会受到十六大后入党（或被“正名”）的资产阶级的反对。⁶⁵

当然，没有人愿意见到冲突的发生。为了释放过剩的产能和资本，为了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为了有足够的超额利润调和两大阶级的矛盾，中国最有可能选择的一条道路就是——谋求在世界体系中的更高位置。至少在目前看来，相对于其他选项，这条道路的阻力还不太大。即使与外国有冲突，也比在国内发生冲突来得好。

事实上，这条道路也正在进行了。2000 年之后，中国就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当前，中国一方面对外大举发力，成立亚投行、金砖银行，倡导发展“一带一路”，四处举行投资商贸会谈，推销高铁；一方面对内大力宣扬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价值观——“中国梦”、“民族伟大复兴”云云，为海外扩张凝聚力量。一切进行得如火如荼，热闹非凡。因而，对这一道路进行分析也就十分有必要了。

⁶² 林岛：对话汪晖：“一带一路”何以成为对“世界历史路径的重新修正”，破土网，2015 年 3 月 28 日，网址：<http://groundbreaking.cn/shishi/1023.html>。

⁶³ 张建新：大国崛起与世界体系变革——世界体系理论的视角，国际观察，2011 年第 2 期。

⁶⁴ 张昕：国家资本主义兴起视野中的“一带一路”，文化纵横，2015 年 6 月刊。

⁶⁵ 在这里，使用“资产阶级”还是“私营企业主阶层”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不过，显然前者更能反映问题的本质——“阶级”更能表达政治斗争的含义。

三、中国如何谋求在世界体系中的更高地位

（一）急剧扩张的资本输出

当前中国的资本输出已经有了非常突出的成果。根据美国商会 2014 年 4 月的一份报告，2013 年，中国对美投资额已首次超过了美对华投资额。比如中国双汇集团去年收购美国猪肉企业史密斯菲尔德食品，收购金额 71 亿美元；万科、绿城等中国房地产企业则开始进入美国房地产市场圈地建房。⁶⁶

2013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 1010 亿美元，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1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 1029 亿美元，超过了外国对华投资，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实现历史性的反超。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1701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2015 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10978.6 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的份额由 2002 年的 0.4% 提升至 4.4%，排名由第 25 位上升至第 8 位**（2011 年 17 位，2013 年 11 位）。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预计，至 2020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将突破 1.2 万亿美元。⁶⁷ 2000 年以前，中国的对外投资流量还不超过 50 亿，仅过了十二三年，就达到了 1000 亿。⁶⁸ 中国对外投资已经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中国将通过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国外捞取大量利润。

2015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八成以上分布在发展中经济体，在发达经济体的存量占比为 14%。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基建投资带动了对外贸易。2016 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在 5000 万美元以上的项目 815 个，较上年同期增加 91 个，累计合同额 2066.9 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84.7%，对外承包工程带动设备材料出口 133 亿美元。

尽管，相对于中心国家来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还较小，占 GDP 比重还比较低，投资质量也有差距，但是相对于边缘国家和大多数半边缘国家而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包括流量与存量）都已经是压倒性的巨大数字了。这一规模的投资总量足以对被投资国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其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也必然是巨大的。直白地说，这一经济基础将导致国内主张对外大力扩张乃至鼓吹帝国主义的声音愈发强大。国内目前最大的国家主义网站“观察者网”的投资人李世默，就拥有中国最大的私营钻井服务商安东石油的股份⁶⁹，其业务遍及中东、中亚、非洲等地。公开资料显示，李世默参与创始的成为基金同样与诸多高干亲属相关联。⁷⁰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对外投资的参与者与投资行业。在对外投资中，国有企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其主导地位体现在投资数额上，而不是在项目数量上。以 2010 年为例，国有企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额上占比为 66%，而在投资项目上占比仅为 10.2%。⁷¹ 在国有企业之间，也有必要区分央企和地方国企。学者王碧珺认为，地方国企实际上可能并不享受比民企更优越的待遇。而央企受到的支持则不同。央企在数量上大概只占 5%，在投资额上却贡献了接近 80%。相对于民营企业和地方国企，央企投资规模普遍更大，投资行业集中于资源类和金融业。

因而，在对外投资中，央企的主导地位显著。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驱动力不是资本积累。因为，即使央企是为了国家战略而投资，其最终落脚点也是在经济效益上，本质上还是促进资本积累的逻辑。

王碧珺认为，服务业并不如国务院公告所显示的那样，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因为企业有以服务业公司作为中介避税的动机。他分析了 1500 多家企业信息后发现：采矿业和制造业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在投资额的分布上，采矿业 52%，制造业 23%。王碧珺称，总体而言，中国目前的对

⁶⁶ 2014：中国对外投资转折年，经济参考报，2014 年 8 月 15 日。

⁶⁷ 中国今年资本净输出额很可能扩大，新华网，2015 年 6 月 15 日，网址：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06/15/c_1115624284.htm。

⁶⁸ 刘阳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 年第 11 期。

⁶⁹ 投资者：创业者李世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网址：http://www.ceibs.edu/link_c/latest/61271_4.shtml。

⁷⁰ 譬如，另一创始人冯波就是某前领导人的外孙女婿。

⁷¹ 王碧珺：被误读的官方数据——揭示真实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国际经济评论，2013 年第 1 期。

外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当地国的自然资源。而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扩宽市场和学习技术、提高产业链位置的动机更为主要。不过，王碧珺指出，出于节省劳动力成本的动机而进行的投资在将来必然逐步增多。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雇佣外方员工122.5万人，较上年末增加39.2万人。

（二）不平等的贸易与金融

2014年，我国进出口总值26.4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14.39万亿元，增长4.9%。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商务部称，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外贸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2014年前三季度，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10.2%，预计全年贡献率将在10.5%左右，创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工业制成品（相对于基础产品而言）占出口总额的95.2%，占比连续三年提高。装备制造业成为出口的重要增长点，铁路机车、通信设备出口增速均超过10%。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4851亿美元，增长5%。生物技术产品、航空航天技术产品、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产品等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速均在15%以上。我国出口产品技术附加值也在不断增加，中高技术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和高技术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分别从1999年的31.33%和22.75%上升到2012年的40.32%和24.02%。⁷²可见，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半边缘国家，既生产核心产品，也生产边缘产品，并在努力地向生产更多核心产品迈进。

新华网在2012年曾报道：过去10年里，中国出口墨西哥、南美洲和尼日利亚的高端、中端技术制造类产品的占比呈上升趋势，向这些国家出口的劳动密集型和低端技术制造类产品呈下跌趋势。比如近年，中国对巴西和墨西哥超过70%的出口都涉及高中端技术产品。从产品类别来看，制造类产品出口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总出口中占到90%。2010年，机械和器材占到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30%以上，对墨西哥出口的制造类产品当中，54%为机械和器材。⁷³

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沃勒斯坦所言的“高工资工人的产品”在中国的出口中会越来越多，正如上述报道所说：“中国的一般贸易正在取代加工贸易成为主要的贸易方式。……加工贸易的兴起主要依赖于广泛可得的廉价劳动力，而近几年我国的劳动力价格快速攀升，加工贸易企业普遍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由此一来，中国与出口基础产品、低工资工人产品的边缘国家的贸易也就愈发的不平等化。

如前所述，外贸对中国经济的支撑很重要，而中国与边缘国家的贸易规模是很大的。当前，中国已成为120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外贸的55%都是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的。⁷⁴换言之，这一不平等交换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维持也是至关重要的。

2014年，李克强出访非洲，提出2020年中非贸易规模要达到4000亿美元左右，中方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向1000亿美元迈进（目前是250亿美元）。中方还决定向非洲国家增加100亿美元的贷款额度，使已承诺贷款提供额度达到300亿美元。⁷⁵为什么在促进贸易、投资的同时，还要增加贷款呢？一方面是为了获取丰厚利息，一方面正如列宁说的那样：

“输出资本的国家几乎总有可能获得一定的‘利益’，这种利益的性质也就说明了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的特性。……‘国外的很多国家……都在公开或秘密地向巨大的货币市场要求贷款，有时还要求得十分急迫。现在货币市场上的情况并不怎么美妙，政治前景也未可乐观。但是没有一个货币市场敢于拒绝贷款，唯恐邻居抢先同意贷款而换得某种报酬。在缔结这种国际契约时，债权人几乎总要点便宜：获得贸易条约上的让步，开设煤站，建设港口，得到利益丰厚的租让，接受大炮定货。’”⁷⁶

实际的例子有：“中国工商银行将为俄开采靠近中国边界地区的铁矿提供巨额贷款的消息，17日引起舆论注意。这个合作计划成了一些俄专家担心的问题。他们声称，吸引中国投资的代价可能会使远东地区

⁷² 屠新泉，苏晓：中国外贸正迈入质变大门，华夏时报，2015年6月5日。

⁷³ 星展银行：中国应加大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出口，新华网，2012年8月6日，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2012-08/06/c_112639284.htm。

⁷⁴ 王受文：世贸成员赞赏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机遇，国际在线，2014年7月5日，网址：http://gb.cri.cn/42071/2014/07/05/7551s4603428_1.htm。

⁷⁵ 李克强谈中非友谊：同哭过永不忘，新京报，2014年5月6日。

⁷⁶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变成中国的资源供应地。俄没有钱向这个地区投资，因此，只能向中国贷款。这就意味着在价格上将不得不向中国做出让步。”⁷⁷

据《卫报》报道，厄瓜多尔政府财政紧张，向中国申请贷款，中方的条件是获取开矿的资格。而开矿的过程要破坏许多原始森林，当地环保组织和土著举行了抗议。其结果是，政府把环保组织取缔了，三名土著领袖离奇死亡。⁷⁸

至此，我们也不就难理解，“金砖银行”、“亚投行”的实际作用究竟为何了。

（三）不想获取超额利润，还是不能获取超额利润？

学者卢荻否认中国的对外投资和贸易具有不平等的性质，他还在一篇博文中说：“迄今对后进国家的资本输出，主要是‘基建换取资源’，就其性质而言这其实是贸易远多于投资。而自 1990 年代以来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即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的比率）持续恶化，作为整体的后进国家的同一指标却是持续改善（发达国家也是），这意味着中国对后进经济的投资应该是不平等交换、榨取后者的经济剩余的成分。另一方面，这种投资会否使得后进经济陷于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地位，所谓‘殖民地国际分工格局’？这有可能，但是既然没有不平等交换，则责任不在中国，而在于投资接收国的内部政治经济构造，能否将得自与中国贸易的利润投资到工业发展。”⁷⁹

卢荻否认中国榨取了经济剩余的方式非常匪夷所思。“国际贸易条件”这一抽象指标有何现实含义，能否真实反映经济剩余的榨取状况，身为人大教授的卢荻完全没有做任何严谨的证明。首先，拿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整体作比较，本身就毫无道理——发展中国家又不只跟中国一个国家贸易，而且各国差异极大。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指数，是跟中国的关系大还是跟其他国家的关系大，这是根本不确定的。因而，它也就根本无法反映，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具体贸易是否存在经济榨取。

而且，国际贸易条件的变化至多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外贸结构、经济发展趋势，根本反映不了经济剩余的信息。中国在城市改革开放初期也经历了国际贸易条件的上升，那时正是外资大举投资的时候，当时中国是否被榨取了经济剩余？卢荻也许会说“否”，而我们会说“是”。所谓国际贸易条件上升，无非是反映发展中国家在低端产品的出口中获得了比较优势，出口相对于进口更加繁荣；而中国该指数的下降，只能反映出口相对于进口的优势逐步丧失，难道还能反映经济剩余外流？——可以说，这一张图，没有关于“经济剩余”的半点信息。

到底什么是经济剩余？按照我们在第一节对沃勒斯坦理论的阐述，我们已经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用高端产品交换边缘国家的低端产品、雇佣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客观上就是了攫取对方的经济剩余。**而且，就是在这样的分工体系下，边缘国家难以积累足够的资本进行升级。在卢荻看来，这一后果似乎只能怪罪边缘国家自己，而攫取剩余的中心、半外围国家则毫无责任——因为我们是“平等交换”！

卢荻也承认，“资本与劳动者在市场上表面的平等交换，仍意味着在生产和分配上实质的不平等交换（攫取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⁸⁰，但是关键就在于，“表面的平等交换”意味着没有“超额利润”。

他说：“资本输出并不一定就是帝国主义，虽然帝国主义必然意味着资本输出。两者的区别，关键在于是否不平等交换，即投资是否享有超额利润。……即使投资享有平均利润仍是剥削，只是这毕竟还谈不上说是帝国主义。”

“《亚当·斯密在北京》的作者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曾经论辩说，中国的崛起，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历史的特例，它使得 Adam Smith 所倡导的平等交换的世界市场首次成为可能。这个论辩正意味着，中国的资本输出并非帝国主义，甚至是对现有的帝国主义形成制约，消减世界范围的超额利润。”

⁷⁷ 俄专家争论中国投资远东铁矿 担心成中国能源基地，环球时报，2010 年 6 月 18 日。

⁷⁸ Ecuador indigenous leader found dead days before planned Lima protest, the Guardian, 2014 年 12 月 6 日，网址：<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dec/06/ecuador-indigenous-leader-found-dead-lima-climate-talks>。

⁷⁹ 卢荻：我们这个时代的帝国主义与中国·笔记，卢荻的博客，2015 年 6 月 9 日，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56c6980102vqex.html。

⁸⁰ 卢荻：希腊左翼能和中国站一条道吗？，观察者网，2015 年 2 月 4 日，网址：http://www.guancha.cn/ludi/2015_02_04_308493.shtml。下同。

且不论帝国主义的评判标准是否是超额利润，卢荻忽视的地方在于：**中国资本究竟是不想获取超额利润，还是囿于与国外资本竞争的不利地位“不能”获取超额利润？**

中国时常对边缘国家进行基建援助，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本国资本更好的积累。在一些情况下，过剩的中国资本如果不能忍受比欧美投资者更低的利润率，就难以确保自己能获得项目，从而连那一点利润率都拿不到。事实上，只要条件允许，中国资本一样会攫取超额利润。至少，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它们不会这样做。

中国北方的蒙古，90%的产品出口到中国，50%的产品从中国进口，50%的外资企业来自于中国⁸¹。试问，在这样的优势地位下，中国资本会没有“超额利润”？卢荻自己的论述都不能否认这一点——“笔者在文中以跨国投资获得垄断利润来界定帝国主义，因为迄今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跨国投资的垄断利润的来源不外乎两途，一是超经济手段掠夺，二是掠夺的积累形成技术上或规模上的优势地位，而中国的对外投资显然不是这样。”真的不是这样吗？

此外还有报道称：“首钢收购秘鲁铁矿之初，曾签订协议称将在未来三年再加投1.5亿美元，以促进铁矿及其社区的建设，但实际只投资了3500万美元，因此遭到1400万美元的罚款。曾有当地人投诉称，‘首钢秘铁对于开矿之外的社区建设并不上心’。……亚洲企业社会责任（CSR Asia）创始人Stephen Frost博士的一份报告曾指出，自2001年开始，首钢秘铁与其雇员及周围社区居民的关系持续恶化：工人抱怨工资低、健康有风险、劳工事故频繁（仅2001年至2005年，就有680起劳工事故发生，并导致5人死亡）；马尔科纳当地居民称，首钢秘铁剥削劳动力，污染周边海岸，对社区发展不尽责。”⁸²类似的报道还有许多，比如有关赞比亚的报道等⁸³。这样看来，所谓的“让利”有多少是真情实意的呢？归根结底，还不是在遵循资本的逻辑吗？

我们要问：即使有的对外投资项目，真的在当地带来了较好的社会效益，赢得了当地人的认可，但这样的情形又能持续多久呢？跟国内一样，边缘国家劳动者的待遇诉求也在逐步提高，到了真的跟资本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国资本又会作何选择呢？

⁸¹ 中蒙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新京报，2014年8月22日。

⁸² 首钢秘鲁铁矿工人将再无限期罢工，财新网，2014年8月12日，网址：<http://companies.caixin.com/2014-08-12/100715967.html>。

⁸³ China in Zambia: Jobs or exploitation?，BBC，2010年12月13日，网址：<http://www.bbc.com/news/world-africa-11898960>。

第五章 民族问题：历史与理论

不同于列宁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面对的欧洲民族问题，中国的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并非直接涌现于资本主义极度发展的情境下。由此，中国的民族问题有其特殊性。在本章的前半部分将历史地讨论具体讨论中国民族问题与边疆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民族问题的基本立场不适用于中国——特别是当下，以“现代化”、“市场化”为名的一整套经济社会体系也在占中国领土近二分之一的边疆 / 民族社会迅速扩张着。本章最后部分将简述列宁对民族问题的论述。

一、历史中的中国民族与边疆问题

在传统帝国统治秩序之下，按照距离王朝中心的远近，各地被按照不同的模式治理。空间上看，传统中国的统治类似同心圆，按照李鸿章的说法（《清季外交史料》），中国从空间上可以分为分为“土” / “藩”，前者国家制钱粮、委派官员，从而形成内陆的省，后者则由其自理。其中，“藩”还分为“内”“外”，“内”“藩”紧贴内陆省份，往往由中原政府形式上任命土著首领为地方行政长官以实现羁縻的目的，而“外”“藩”是宗藩，往往只履行朝贡及礼制的义务。在传统中国，比如清代，对边疆地区和中原地区实行不同的治理方式维系了帝国的统一。而有清一代，在维系帝国的统一上，清皇室采取了灵活多元的策略。在面对满洲人、蒙古人、藏人、汉人时，清皇室分别采取不同的策略、扮演着不同的身份，如对满人的族长身份、对汉人的天子身份等。简而言之，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中原地区实行郡县制，而边疆社会则因俗而治。

由此看来，一方面，大体上看，今天的中国领土包括了帝国时代的“土”与“内”“藩”，所以，并不是所有地区都有着长期经受郡县制治理的传统。正是在这一点上，一些学者在讨论民族问题时，关注的是如何在民族地区成功推行郡县制（《化边之困》）。另一方面，土地与人民也是高度相关的，对一片土地的治理模式的转换也意味着转换对当地的人的治理模式。正是在这一点上，内地某些学者暗示了要将内地各类文化语言等模式扩展至民族地区（以后我们会对“第二代民族政策”进行讨论）。而当下，对民族地区的政策也往往要求民族地区的居民要形成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如果说，仅仅记得宣传上常遇到的语言，即各个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这显然就是一个奇怪的表述，毕竟民族地区的居民的文化已经就是中华文化了。但是，放在这一框架下思考，则可以清楚的看到期间的意味。

民国时期，对于民族地区，国民政府时常鞭长莫及。西藏地区在事实上维持着独立状态，国民政府只在名义上保有主权，而新疆、青海地区则由当地的军阀所实际控制。这也可以从中共的对民族地区策略上看出：比如，1940 年，按照列宁主义原则，中共曾支持藏族成了西藏共产党。按照当时的观点，当整个中国还是处于反动政府统治的情况下，藏族当然可以通过成立共产党并开展革命斗争以独立的方式摆脱反动统治。而 1949 年，中共将解放西藏的前夕，西藏共产党则并入了中国共产党。（相关历史可参见第五届、六届、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平措汪杰的回忆录）

而在 1949 年后，按照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新中国政府完成了两项重要工作：民族身份识别与民族自治区建设。民族身份识别是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来完成。对其的具体评论，我们将在列宁民族理论部分进行。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p. 64

这一政策的实行，维持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并促进了民族团结。而这一民族政策虽然也有其教条化问题（比如硬性将各个民族社会划分为不同社会阶段），但是这一政策直面了当时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体系（生产关系）是处于完全不同的状况。当时的民族政策也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

然而，在当代，我们却发现大量的民族问题涌现。一方面是民族地区频繁发生的各类“事件”，一方面则是内地居民对来自民族地区的人们的误解。目前，国内日益频现的是对少数民族的恐慌与排斥。毫无疑问，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如果不直面民族问题背后的深层经济社会根源，我们只会沦入单纯的民族仇恨。

下面的摘文较好地描述了以西藏为代表的民族地区存在的问题。其中的几个判断，如民族地区处于一种输血状态、“稳定集团”的存在、吃饭砸锅的原因等与我们这几年的观察比较符合，所以在处理掉其中的偏激语言后，摘录如下。但是，要说明的是，该文发表于1998年，其中提及的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体系大体上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是，还是几点必须在此提出：90年代的市场经济比较粗放，远没有今日那么精细化，当下，政府日益积极地介入到民族地区的民生改善上去，比如以“扶贫”的名义力图大幅度提高民族地区一般民众生活水平，所以，今天再称西藏一般民众没有受到“现代化”的影响显然是荒谬的；习近平在2015年的相关工作会议上，也强调西藏等民族地区加强自身的造血能力，由于时间较短，我们暂时也并不能判断出其结果。

根据《十七条协议》达成的……原则，早期的中共“稳定集团”[政府干部等实际掌握政治经济权力的人员]与西藏传统社会各自独立，互不关联，除了上层之间进行协调，基本是各搞各的。不仅政治方面如此，经济方面也尽量不发生联系。因为西藏生活资源贫乏，不可能满足外来的庞大“稳定集团”的物质需要。……军队刚进入拉萨时，就因为在当地筹粮造成市场粮价飞涨，带动拉萨全面通货膨胀，几乎酿成政治事件。中共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对“稳定集团”采取全部供养，所有物资都从中国内地调运，“稳定集团”全体成员从工作到生活的一切需要都由中国内地满足，不和当地经济发生关系。……对当时以军事人员为主的体制，全面供养制也是一种理所应当的方式。西藏今天的供养型经济，可以说就是从那时种下的种子。……西藏初始的现代化事物大都是由“稳定集团”带来的，或是围绕对“稳定集团”的供养而发展的。如西藏有史以来的第一座现代化工厂——拉萨汽车修配厂，就是为维修从内地给“稳定集团”运输物资的汽车而建造的。现代化的强行嵌入给西藏带来了公路、机场、银行、广播、通讯网络、现代医院……如西藏的现代企业之一——昂仁煤矿，每年产出的所有煤，当地老百姓是从来不用的，全都卖给当地驻军。……

[85年、95年依靠内地资金支持，在地政府在拉萨市进行大规模建设]不管这些工程多么“现代化”……但是西藏社会的主体与这种“现代化”之间却没有实质性的关系，也不可能从这种现代化中得到益处。举例说，西藏体育馆是“二十年大庆”[85年]的产物，至今已经盖起了十多年，但总共加起来也没有举行过几场体育比赛或演出，不要说普通西藏农牧民，就连大部分拉萨市民也从来没有迈进过那座体育馆的大门；花费巨大的西藏图书馆，养着好几十名工作人员，办理借书证的不到一千人，真正看书和借书的更是寥寥无几。……[两次大规模建设]项目和资金中很大一部分都投在了首府拉萨（二十年大庆的“四十三项工程”，全部9亿元人民币投资，7.6亿给了拉萨），因此拉萨以外的藏人与这些“现代化”的关系就更少了。

在其他事情上，只要涉及到出钱，各省市总是与北京讨价还价、搪塞和拖延，但是在西藏工程上，各地甚至不惜牺牲本地利益。如湖北援建西藏措美县的当巴水电站，西藏报的预算是2800万元，实际建成后花费的资金高达7400万元。施工当年正赶上湖北发大水，损失了几百个亿，本身处于非常困难的状态，为了筹措那笔给西藏一个县建电站的资金，湖北决定省内每度电加价一厘收费，除了少部分贫困地区免收以外，可以说80%的湖北人都为措美的当巴电站出了钱。

7400万元如果用在湖北，可以建起8万千瓦的电站，用在西藏，只能建到1.5万千瓦。且不算这方面的投资效益比，湖北人被告知他们出的钱是用于造福西藏人民，然而当巴电站的作用是什么呢？——它解决了措美县城和县城附近八个乡的照明。

……七十年代西藏汉人干部和职工（“稳定集团”成员）纷纷把内地亲友弄到西藏“农转非”，也成为当时促使西藏“现代化”发展的原因之一。……但仅仅转为城镇户口还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有了城镇户口才可以成为“公家人”——领工资的国家职工。为了使他们来西藏“农转非”的内地亲友成为国家职工，在西藏掌权的[人员]除了尽可能地扩大已有单位的编制（这是造成西藏冗员众多的原因之一），还会想方设法

地上项目。每开一个工厂或商店,就能提供一批相应的工作岗位。在当年,那可是最为稀缺和宝贵的资源。在审批项目的过程中,每个环节的审批者可能就因为有一个亲属需要安排,或是他的上司、同事有类似的问题需要解决,审批就会因此顺利地通过……

……1993年西藏共有市镇人口38.48万,“稳定集团”的成员及家属都是市镇人口,以十六万“稳定集团”成员每人有一个家属计算,“稳定集团”及其家属就已经达到32万人之多……“稳定集团”在毛泽东时代以汉人为主体的,近二十年汉人纷纷调回中国内地,藏人官员掌握实权,新被纳入“稳定集团”的名额也主要给了他们的亲友,……1994年西藏国有单位干部职工总数中,藏人所占比例已经达到67.8%。

藏人在西藏“稳定集团”内占据多数和把持主要权力,成为“稳定集团”加剧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一方面是为自身争取好处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又往往以藏民族的代表自居,他们中间的官僚与一般职工之间,既有彼此对立,又有相互统一。在为自身争取好处方面,藏人官僚向北京争的是拨款、优惠政策或是更多的权力,普通职工的关注则主要集中在供养方面——更多的工资,更好的住房,更多的休假等。由于职工及其家属就是西藏城市居民的主体,西藏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因此都成了与供养“稳定集团”有关的问题。几十年的供养已经使藏人形成了习惯,就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习惯“大锅饭”一样,供养必须一直维持,不能停,不能减少,稍有问题就可能引起巨大不满,甚至导致西藏城市社会的反抗活动。

属于“稳定集团”的藏人虽然是一个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集团,但只有其中的藏人官员从担心权力失落的角度抵制达赖阵营,普通的藏人职工不属于权力阶层,因此他们并不把稳定西藏当作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很多人甚至根本不清楚自身与“稳定集团”之间的共生关系,丝毫不为此感激中共的供养。因此藏人职工中不仅有很多人接受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政治主张,甚至比“稳定集团”之外的农牧民还更为激烈。八十年代西藏发生历次反对中共统治的示威活动,除了宗教界人士,往往就是城市的年轻职工参与最多。

……由此导致了西藏问题上的一个奇特现象——乱则生利。拉萨1989年发生大规模骚乱,导致了军事戒严,但是当年[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就猛增20%,超出原本许诺每年递增10%的一倍,第二年拨给西藏的基建投资竟一下增加了84%……西藏目前的状态是,社会在任何方面的不满,几乎都会转变为政治上的不满,随之就会喊出要求西藏独立的口号。其实西藏真的独立了,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回来统治,现在国有单位绝大部分都得被解散,职工也都将失去饭碗,更别说享受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了。除了中共以外,世上还有哪一个政府会花钱养这么多无所事事的职工呢?

……对此,有的汉人愤愤不平地计算……西藏全部人口中每人每年都能从北京得到五百元左右,也就是说,全西藏的人即使一年到头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得到的收入也超过中国内地大多数老百姓一年辛苦干到头的收入,因此有人说出“汉人的血汗养活了藏人”那样的话。

但是这样计算显然是不公平的,西藏老百姓没有直接得到那些钱。……事实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的三十年,所创造的工农业产值全部加在一起才是三百亿多一点。而在北京给西藏的三百五十亿当中,分给西藏农牧业的顶多是个零头,因此农牧业产值与那三百五十亿元关系不大,如果不算农牧业产值,只把西藏三十年的工业产值加在一起,那就更少得只剩六十多亿元(1965年到1993年28年的工业产值之和为50.33亿)。这样一种三百多亿投资对六十亿产值的关系,怎么能被视为是对经济的投资呢?哪里有经济的意义呢?只能被视为消耗。……今日西藏,凡是需要花钱的事,只要去追踪钱从哪来,源头几乎全在北京。如果离开北京的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市)连几天都难维持下去。

——王力雄,《被供养的现代化》,《天葬》,1998

在此,我们必须提及的是,所谓“贫困”,是在当代的经济体系里的衡量。正是因为有了发达的货币经济,才可以衡量出哪些人是贫困的(缺少货币的)。而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中的民族地区农牧民而言,贫困并不是一种属于他们自身的概念。但是,当国家的“现代化”工程扩展至哪里时,他们就必然是贫困的了——他们不是企业职工,他们缺少获取货币的手段。

另一面,中国民族地区问题也在全球化时代(也是沃勒斯坦阐述的“现代世界体系”)染上了它的民族主义色彩。

全球化对于那些弱小民族和非主流宗教文化传统，特别是对它们的认同和利益的解构和破坏是灾难性的，如果对这种负面的影响不及时地予以预防和阻止，它们都有可能瞬间灰飞烟灭。所以，构建和强化自己的民族、宗教和文化认同，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便成为当下世界许多相对弱小和非主体的民族、宗教和文化传统需要面对和为之拼搏的一项最迫切的使命，甚至可能是一场顽强的生死之战。而当他们坚守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认同、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的努力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和有效的控制时，就很容易会走上激进、不理智，甚至暴力的道路，这就是目前我们这个地球村所面临的一大困境。

——沈卫荣，《全球化背景下的藏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研究》，《文化纵横》

我们不妨引用共产党宣言里的那段经典的论断，它极精彩地论述了当代问题的实质：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二、列宁民族理论简述

在列宁的时代，民族主义、民族问题已经是既存的严峻事实。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各民族间交往的加强，在列宁看来，都是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呈现出的趋势。也就是说，民族主义问题、民族问题，是一个现代问题，是一个资本主义兴起所必然产生的问题。列宁观察到，正是资本主义的扩张，刺激着民族主义的产生。对此，列宁要求无产阶级采取彻底的民主主义立场。只有这样，才能根本上粉碎压迫民族或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利用民族主义裹挟无产阶级的阴谋，各个民族的无产阶级才能真正团结起来。

无论在奥地利还是在俄国，一切民族的资产阶级都高喊“民族文化”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在分裂工人，削弱民主派……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世界，在追逐金钱、互相争吵和人剥削人的世界，民族问题能够解决的话），那就是施行彻底的民主主义……工人民主派的民族纲领是：绝不允许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享有任何特权；采取完全自由和民主的办法解决各民族的政治自决问题，即个民族的国家分离权问题；颁布一种全国性的法律，规定凡是赋予某一民族任何特权、破坏民族平等或侵犯少数民族权利的措施（地方自治机关的、城市的、村社的等等），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同时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要求取消这种违反宪法的措施，都有权要求给予采取这种措施的人以刑事处罚……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选集》第二卷，1995，334

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能只限于发表一些泛泛的、千篇一律的、任何一个和平主义的资产者都会加以重复的反对兼并、赞成一般民族平等的言词。对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感到特别“不愉快的”问题，即以民族压迫为基础的国家疆界问题，无产阶级不能回避，不能默不作声。无产阶级不能不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一个国家的疆界以内，这也就是说，要为自决权而斗争。无产阶级应当要求受“它的”民族压迫

的殖民地和民族有政治分离的自由。否则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就会始终是一句空话，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之间的信任和阶级团结都将无从谈起……被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必须特别维护和实行被压迫民族的工与压迫民族的工人的充分的无条件的（包括组织上的）统一。否则在资产阶级的种种诡计、背叛和欺骗下，就不可能捍卫住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和它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因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经常把民族解放的口号变成欺骗工人的手段……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1995，p. 566

但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并不是制造出无数的小国、小民族。民族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事实，但是，对于各个民族的无产阶级而言，要跨越这一民族的界限，共同为社会主义目标而奋斗。对于民族文化，列宁认为，**只有在彻底的民主主义社会中之才能谈论民族文化**。但同时，列宁认同社会存在发展的必然趋势，比如教育的世俗化。当各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后，当他们团结起来建设其一个民主集中的国家时，他们将实行共同的纲领性政策。我们可以从列宁对教育问题上理解他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国家要实行以世俗化的教育，但这一教育由无产阶级政权规定主要的方向，而具体的细节，则将由地方共同体民主决定。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各个民族的文化将由民主且自治的地方共同体进行保存，一个地方的文化将由这个地方的人民民主地决定如何保存、发展。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的现象，消灭一切民族隔绝状态，不只是为了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1995，p. 564

而面对当前面对的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实际状况，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必须与一切大民族沙文主义、封建主的或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进行斗争。

……“保卫祖国”的唯一办法，就是用一切革命手段反对自己祖国的君主制度、地主和资本家，反对我们祖国的这些最可恶的敌人；大俄罗斯人“保卫祖国”，只能是希望沙皇政府在一切实战中遭到失败，这对十分之九的大俄罗斯居民为害最小，因为沙皇政府不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压迫这十分之九的居民，而且还使他们腐化堕落，寡廉鲜耻，让他们习惯于压迫异族人民，习惯于用一些貌似爱国的虚伪言词来掩饰自己的可耻行为。

——列宁，《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列宁选集》第二卷，1995，p. 451

……为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长期地用最充分的民族平等和友爱精神教育工人。因此，正是从大俄罗斯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必须长期教育群众，使他们以最坚决、最彻底、最勇敢、最革命的态度去捍卫一切受大俄罗斯人压迫的民族的完全平等和自决的权利。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不是奴才心目中的那种自豪感）的利益是同大俄罗斯人（以及其他一切民族）无产者的社会主义利益一致的。

——列宁，《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列宁选集》第二卷，1995，p. 453

结合列宁的理论，我们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思考。在中国这个工业经济尚未全面开花的国家，我们该如何面对民族问题呢？经由我们的田野观察，我们发现，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尚未在一些少数民族（如藏族）中造就无产阶级群体，相反，由于国家政策的缘故，“现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商业精英甚至工业精英，以及由时下国家教育塑造出的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却已经大量涌现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的潜在代言人、鼓吹者涌现出来了，但是无产阶级迟迟未现身。我们该如何直面这一状况呢？

第六章 女性与 LGBTQ+ 的平权运动

自诞生伊始，马克思主义就与被压迫者的解放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章中，我们以女性和 LGBTQ+ 群体的平权运动为例，对此进行简要说明。

在女性甚至缺乏政治权力的十九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在一系列论著中⁸⁴对女性受到压迫的事实给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同性恋解放⁸⁵不是马克思时代的主题，马克思时代的人也几乎不可能做到不认同。但二十世纪的革命史和民权运动史却证明，马克思主义正是同性恋解放及后来更激进的理念如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的一个理论源头。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不必全盘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每个个别结论。例如，恩格斯之后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对“历史上曾大规模存在母系社会”的结论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但这一结论的失效仅仅说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分析（或者说十九世纪及以前的许多著名的人类学家的分析）有缺陷——他实际上隐隐地掉进了经济决定论的线性历史观中，而这不足以对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构成挑战。

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在分析女性和性少数群体遭受的压迫时得到了很好的展现：**既然超验于历史的“人的本质”是不存在的，那么有何理由认为男女固定的分工（如“男主外女主内”）、“直人=正常”等性取向的规定，以至于男女划分这样的范畴本身是天经地义的、亘古不变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给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所有的这些范畴都是历史建构的结果，这种建构与一定时代的生产关系密不可分。**这一结论对于后世的种种历史建构理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更为现实中女性和 LGBTQ+ 群体的平权运动提供了非常强大的思想武器。

在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是没有在女性权利问题上得到贯彻的。在十月革命后的头七、八年内，布尔什维克党推出了一系列非常进步的政策，这些政策不仅赋予了女性以前所未有的与男性平等的政治、工作、受教育以及婚恋权利，也弘扬了一种国家不干预私生活的观念，这与当时的西方国家对比极其鲜明。不过，随着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变质，1930 年代以后各大共产党逐渐恢复保守主义政策（如婚姻政策趋向保守）。但社会主义运动的遗产却还是有所保留，而仅仅是这部分的保留，就成为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三八”劳动妇女节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当今世界上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几乎一切权利，都是无数的先驱在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关联运动中用生命换来的。

也必须提及女权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与合。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名著《第二性》就对以恩格斯家庭理论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质疑。波伏娃认为，恩格斯将女性受到压迫的原因归结为生产关系，这尽管非常深刻，却不够全面。然而她所批判的事实上仅仅是恩格斯采用经济决定论的做法，而马克思主义分析必然密切注意经济之外的各种因素；这每一种因素，都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实践活动的结果。波伏娃的质疑，反映出**女权运动界对以苏联为代表的教科书体系的失望**：为了服务于苏联的政治斗争，教科书体系将经济决定论发挥到极致，而完全无视了受压迫妇女们现实的、亟待改变的状况，结果便造成了女权运动与这个“父权制的马克思主义”的“离婚”。

社会主义实践鲜为人知的一面是其对同性恋的解放。特别地，**苏俄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将同性性行为去罪化的政权**，这与当时西方国家的保守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不过，日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变质也导致了这些进步政策受到取缔。西方国家的这些政策，是在民权运动和性解放运动的大潮之中才逐步形成的，那已经是十月革命之后几十年的事了。

西方的同性恋解放运动在早期明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美国的第一个造成政治影响力的同性恋解放社团是马太辛（The Mattachine），这个社团的创始人全部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在历史上首度采纳了唯

⁸⁴ 可参考《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论著。

⁸⁵ “同性恋解放”不能概括后来的一系列事件，但这是历史上的叫法，所以在某些语境下予以保留。

物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同性恋群体受到的压迫，并运用共产主义运动中习得的经验，为同性恋解放运动打响了第一炮。这个社团后来夭折于麦卡锡主义的扼杀，但它却对美国的民权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后来的民权运动中，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有些思想分支开始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但酷儿理论，作为性少数群体解放运动的重要指导理论，却始终保持着一条与马克思主义紧密关联的线索。这一理论的先驱莫妮卡·威蒂格就是一位将马克思主义分析运用到女同性恋解放运动中的社会活动家。威蒂格和阿尔都塞都影响了朱迪斯·巴特勒这位当今最有影响力的酷儿理论家。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会给出这样的结论：**异性恋话语霸权对于现行资本主义社会的维护，其重要的一点在于促使人们繁衍后代，从而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力需要再生产-需要繁衍后代-需要异性性行为-只有异性恋才是“正常”的——这就是通行的逻辑。**尽管借用的是“维护家庭”“保卫道德”的话语，这一逻辑实际上却服务于现行的资本主义体系，这个体系拒绝为劳动力的再生产提供足够的保障，将其完全推给家庭。因此，**女性的解放和 LGBTQ+ 群体的解放，乃至人类情欲的解放，必须要以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为前提，而这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可能实现。**推翻资本主义，是这一过程的第一步，后续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限于篇幅，这里将节选几个较简短的文献片段，用以解释上面的概述。

【1】

妇女解放有两条不同的道路——女权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兴起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运动中，女权主义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它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男人始终压迫女人，男人的生物构造或心理构造使得他们把女性看作劣等人。这导向一个见解：只有通过把女人跟男人分离开来，才有可能解放——要么是寻求“解放的生活方式”的女权主义者的整体的分离（即“独立”，separation），要么是妇女委员会、妇女核心小组（women's caucuses）或只供妇女参加的活动（women-only events）这些局部的分离。

支持这种局部分离的人中间，有很多自称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但后来主张整体分离的**激进女权主义**思想在妇女运动中占了上风。分离主义思想每次都仅止于作为妇女庇护所之类的社会服务事业中稍为激进的一翼。

这一失败使得很多女权主义者转到另一个方向——接近工党。他们相信把合适的妇女放到合适的位置，比如国会议员（MPs）、工会官员、地方议员，将以某种方式有助于所有的妇女得到平等。

革命社会主义的传统从另一套相当不同的思想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 1848 年从事著述时就谈到，首先，对妇女的压迫不是源于男人头脑里的意识，而是源于私有财产的发展和与此伴生的阶级社会的出现。对他们来说，为妇女解放而奋斗同结束阶级社会——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分不开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立足于工厂制度，它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深刻的改变，尤其是妇女的生活。妇女回到了社会生产中，从前她们曾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而日益被排除于社会生产之外。

这给妇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潜力。通过共同组织起来，作为工人的妇女能够拥有更大的独立性和能力，去争取自身的权利。这跟她们以往的生活形成强烈对照。以往她们在生产方面的主要角色是处于家庭之中，这使她们完全依附于家长——丈夫或父亲。

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此得出结论，家庭的物质基础，以及女性因此所受的压迫，将不复存在。是财产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一事实阻止了妇女从中受益。使得妇女至今仍受压迫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尤其是资本主义采用一种特殊的家庭形式以确保工人能把他们的孩子抚养成为下一代的工人。男人——以及日益增多的女性——的受薪工作对它有巨大的好处。妇女将无偿奉献她们的一生，来确保她们的男人以及长大以后的孩子适应在工厂里工作。

相比之下，社会主义认为社会应担负起许多沉重地压在妇女身上的家庭职能。

这不等于说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四处鼓吹“废除家庭”。家庭的拥护者总是能够动员大量最受压迫的妇女来支持它——她们把“废除家庭”理解成准许丈夫抛弃她们以及对子女的责任。革命社会主义者总是试图说明：在一个更好的、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妇女将不会被迫过着像当今时代的家庭那样可怜、狭隘的生活。

女权主义者总是拒绝这种分析。他们远离妇女可以从中拥有力量来改变世界并结束压迫的地方——在她们有力地联合起来的工作地点——他们只把妇女当作**受害者**。例如，1980 年代的运动从关注核武器转向了关注卖淫、强奸、对妇女的恐吓，以及家庭。也就是从妇女处于弱势的地方着手。

女权主义从这样的假定出发：压迫是超越阶级划分之上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让阶级社会原封不动，去提高**某些**——即少数人——妇女的地位。妇女运动变成由“新中产阶级”妇女来支配——新闻记者，作家，大学教师，高级白领工人。而打字员、档案管理员、机械工则被丢在一边。

只有在激进变革与革命的高涨时期，妇女解放的问题才会变成现实，不是只为了少数人，而是包括了全体工人阶级妇女。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为妇女带来的巨大平等，是这个世界上前所未闻的。离婚，堕胎，和避孕自由都可享有。抚养小孩和家务劳动变为社会责任。开始有了公共食堂、洗衣店和托儿所，这妇女带来了得以控制自己生活的诸多选择。

当然，这种进步与革命自身的命运不可分割。饥荒、内战、工人阶级的大量牺牲，以及世界革命的失败，导致社会主义在俄国最终陷入失败。步向平等的进程发生了逆转。但是早期的苏维埃共和国已表明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做到什么，即使在最为不利的条件下。今天，妇女解放的前景要好得多。在英国——正如在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每五名工人当中就有两名是妇女。

妇女解放只能通过工人阶级的集体力量才能达到。这意味着要拒绝妇女单独组织的女权主义观点。只有当男工和女工参与到统一的革命运动中，共同行动，才能摧毁阶级社会，以及与此相伴的对妇女的压迫。

——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何在》第十二章《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

【2】

1950年，为响应建设新疆的号召，大量妇女进入新疆。当时之所以大量号召妇女进新疆，重要原因之一，是要解决新疆男兵的婚配问题。

这段历史，最近引起了极大争议，许多人对这段历史发出了激烈的批评。对此，环球时报作出这样的回应：

再伟大的历史，也会有不如意、甚至某些悲伤的细节。八千湘女中，肯定也会有令人唏嘘的个人故事。但她们是有尊严的，那种尊严如果用今天城市小资中流行的卿卿我我的尺度是很难衡量的。

中国的革命史和新中国的建设史总体上是一部上升曲，它无疑是复杂的，但它值得最严肃的尊敬。斜吊着眼睛、咧着嘴角看共和国的历史，或者是一种心理不健康的猥琐，或者是人云亦云的自以为是。

是谁斜吊着眼睛看共和国历史？

1950年，新中国的《婚姻法》开始实施，法律的第一条指出：

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湘女进新疆的历史也开始于1950年，妇女进新疆后，特别是初期，不少女兵被干部包办婚姻。

……

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委会编辑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中讲到：

1953年，新疆军区政治处组织部长刘一村在会议上，批评有些干部不顾女方自愿与否，单纯为了照顾老干部，从各方面来所谓打通思想，使女方勉强同意，致使有的女同志说，“过去旧社会在家里父母包办，今天在部队上组织包办”。刘一村指出，这种行为导致女同志悲观、苦恼、工作不安心，甚至发生自杀行为。他代表军区督促各单位进行婚姻条例的专门学习，彻底实行婚姻自主原则。

另外，1953年8月3日，新疆军区党委《对农二师女精神病情况报告的复示》，提出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包括在全体妇女中同时进行一次正确的婚姻法教育，对妇女进行安慰和治疗疾病，不准禁止已订婚妇女和原来爱人通讯或扣押来往信件，绝对禁止强迫她们和原来爱人离婚、强迫断绝关系的行为，等等。

由此可见，当时进入新疆的妇女，由于婚姻以及各种问题，引发的自杀、精神病状况，已经引起了新疆高层的重视。

……

1952年，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中说道：

封建思想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参与，不仅在一部分人民中，甚至在不少的干部中，依然留有深固的影响。根据各方面的报告，许多地方带有封建思想的人仍有继续干涉男女婚姻自由、虐待妇女和子女等非法行为，而一部分干部竟对此种非法行为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或者有意予以宽纵、袒护，甚至他们本身也作出直接干涉男女婚姻自由的非法行为……

……

如此多的史料，如此严重的问题，从新疆高层到国家高层，在当时都对干部包办婚姻引起的妇女悲剧如此重视。环球时报竟然认为这只是历史中的小细节而已！到底是怎么样心理不健康的人，才会认为妇女

婚姻问题只是“大历史”中无关紧要的一个小插曲？到底是谁斜吊着眼睛看共和国历史？难道不就是环球时报吗？

怎样才算妇女解放？

在环球时报看来，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妇女们“为自己参与了那段历史而感到骄傲。”参与了新疆的建设，新疆发展起来了，妇女问题就微不足道了吗？妇女就解放了吗？

环球时报笼统地以“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上升来理解妇女解放，简直倒退了60年。1957年，全国妇联妇女干部学校部分学院对妇女解放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记录记载在了《妇女工作》上。其中，学员们得出共识，妇女解放了没有，可从三个方面来看，即：**反动统治阶级推翻了没有？私有制消灭了没有？束缚妇女的法律取消了没有？**在土改没有完成，干部包办婚姻严重的情况，新疆的本地妇女与援疆妇女明显依然遭到不同的束缚。为什么今天讨论当时妇女的遭遇，成了“城市小资中流行的卿卿我我”呢？而且在当时的讨论中，有同志认为：看男女平等问题，要实事求是，不能硬比或绝对化，非要男的干啥，女的也干啥才算平等，这是不恰当的。

.....

援疆妇女的婚姻问题主要是干部的官僚主义问题，而这一点在部队中更难处理。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国家高层一直用各种方式反对官僚主义，但由于缺乏基层有效的群众运动，效果一直欠佳。时至今日，官僚问题更加变本加厉了，这是官僚主义的胜利，人民的失败。

在家庭分工的问题上，体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的缺陷。他们曾经认为，只要私有制经济基础被消灭、妇女进入社会劳动，妇女就可以实现解放。在当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私有制经济几乎被消灭，但私有制遗留的思想残余和官僚主义思想并未被消灭，当时妇联为妇女解放做了大量工作，但问题仍然严重，包括家庭的男女分工，男女同工不同酬，工作中忽视性别差别等。

以经济发展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掩盖经济发展中各种对立的矛盾，忽视弱势的一方，这不正正是最典型的资产阶级历史观吗？一律把批评的声音理解为对新中国历史的抹黑，对历史问题一概而论，这只会让历史上的反革命因素更好地保存下来，真正地阻挡中国的革命发展。

——节选自微信公众平台“微工荟”2017年2月22日推送

【3】

资本主义的自由劳动体制，与同性恋又有什么关系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资本主义的一些特征。其中，劳工从两个角度来说“自由”的劳动者。我们拥有找工作的自由。我们拥有工作的能力，也拥有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买主的自由。我们当然也自由地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在我们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并不拥有制造产品所需的土地或工具；但是为了要生存，我们就不得不工作。因此，如果让我们可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那么我们也可自由地选择毫无其他出路。这种辩证关系——又自主又被剥削的关系，正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生活的人的状况。

资本的扩张与受薪劳动的扩大，对核心家庭的结构与功能、人们对家庭的观念、对异性恋关系的意义等，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性恋族群的出现主要与家庭转变有关。

.....

但对那些首先受到此种变化冲击的人，家庭产生另一种新的作用，它不只是提供食物，也提供情感与欢乐。到了二十年代，家庭变成了个人生活的场所，而与那以往家庭作为工作、生产的公共场合完全地断离。同时，异性恋关系的意义也变了。生育率持续下降（即使在严禁各种避孕措施、堕胎的状况下），到了七十年代，妇女的生育率降到两个小孩以下（与之相比，殖民地时期每位妇女均生七个以上的子女——因为家庭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因此，当雇佣劳工越来越多，而且被集体组织起来共同生产时，性活动也由“上天诫命”给转成生殖。于是在观念上，一男一女的异性恋关系成为一种建立起亲密关系、促进喜悦欢乐经验的方式。

资本主义在打破家族自主性经济、把性活动与生殖活动分开的同时，也开创出一些社会条件，而使得一些男/女性可以有机会来发展以自己同性恋爱为中心的个人生活。它促发当今男/女同性恋者在都市中心各种小圈子的形成，而且更造成了当今打着性认同旗帜的政治活动。

由新英格兰时期法院及教会训诫中的记录，我们可知：男/女同性性行为在17世纪就已出现。但同性间的性“行为”，并不等于同性恋“认同”。这道理很简单，在当时殖民式生产体制下，男/女人并没有什么“社会空间”来发展成为“同性恋者”。所有的人都得依着与家族经济生产而生存。虽然即使有同性间的性活动——像男性间的肛交、女性间的“淫荡”等——但家庭分量是如此地重要，以至于在殖民时代，并没什么“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这些字眼。当然在当时，一定有男性/女性会喜欢同性更甚于异性，而且在一些

法院案件中也提到一些男人有“不自然”的感情，但这在当时并不形成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

但到了 19 世纪中叶，当自由劳动式的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时，整个的情况也开始转变。只有当“一个人”靠受薪工作而能自立更生，而非作为一个自主性经济的家庭的成员时，对同性的爱欲才能与个人身份认同联结起立。这种认同由二方面的条件促成：一个人能脱离异性恋式的家庭关系，以及一个人以自己对接同性的爱恋，而建立起自己个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到 19 世纪末，便出现这样一群男女，他 / 她们自认爱恋同性，自认他 / 她们的这个特质“与众不同”，而且不断地在寻找同类的人。

.....

虽然男 / 女同性恋者在 70 年代争取到一定的成果，挣开更大的空间；但我们仍未能把整个“异性恋观念”、“同性恋恐惧”给完全消除。另外也有人认为，对同性恋的压迫仍然存在，只是阵地转移了；由国家直接下手，转到对男 / 女同性恋者进行直接攻击、殴打。而且当我们的运动开始蓬勃发展的同时，反面的力量也一致想把我们的战果再抢夺回去。新右派以打着“家庭至上”的旗帜，逐渐形成气候。为什么那个在结构上主张同性恋身份认同、鼓励都市同性恋圈子兴起的资本主义，却会发过来拒绝男 / 女同性恋者，为什么“异性恋观念”、“同性恋恐惧”是如此地难以消除？

我认为答案应由家庭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关系来探讨。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运作使得以往家庭成员的经济依赖关系逐渐消失，而摧毁了那构成核心家庭的物质条件，这使得以往促使男女组成和维系家庭的力量逐渐瓦解。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又把家庭给神圣化，将之设定是人们情感、互相关心的源泉，把家庭当作是能满足我们稳定的、亲密的人际关系场所。

——节选自 John D’Emilio 《资本主义与同性恋身份》

【4】

同性恋运动在人数上获得显著壮大，并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扩展至各大洲。在其他运动仍处于守势时，他们在一些国家设法赢得了重大改良。从八十年代起，同性恋运动出现在亚洲、非洲以及东欧的许多国家里，这些地方之前根本没有这个运动；他们在之前曾遭遇挫败的拉丁美洲的几个主要国家（墨西哥、巴西、阿根廷）重拾力量；在西欧和北美几次动员过几十万的人。

我们亲身参与这些运动已获得了重要的经验教训，现在在本文中将它表达出来：

1、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LGBT）面临的压迫是全世界各国的现实。将同性恋与艾滋病联系在一起已经导致男人之间的性行为和一夫一妻制异性恋家庭之外的性行为蒙上全球性的污名。性问题通常是政治问题。

2、LGBT 人群遭受的压迫和妇女遭受的压迫之间的联系是我们理解的关键，他们争取解放的斗争自然也紧密联系在一起。

3、我们捍卫 LGBT 人士自治运动的必要性，并懂得没有自我组织不可能消除压迫。

4、我们为理解同性恋斗争与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而斗争，同时避免将同性恋斗争从属于其他一些运动

5、我们为解决问题的国际主义的方法而斗争。LGBT 人士在各地受到压迫，虽然形式不一。这个运动需要在国际上组织起来，并与最受压迫的人们团结一致。

6、为了开展这些任务，我们必须整顿自己的人马——革命左翼。这需要在许多方面改变我们的组织。

.....

同性恋的歧视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父权制异性恋家庭制度。按照 1979 年关于妇女解放的决议的说法，这种家庭是“使社会的阶级分化能代代长存的最基本社会经济制度”。家庭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在形式上有所发展，它提供了“最廉价和思想上最可接受的机能，用以劳动力的再生产”（通过大量无偿的女性劳动：照料老幼以及参加工作的成人），以及“在自己里面制造等级分明的权威关系，这是维持整个阶级社会所必需的”。这种家庭形式对妇女和儿童尤为压迫。这种家庭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代一代地再生产出有点足够的关系，其中心是一夫一妻制的异性爱恋，而这最终被认为婚姻，新家庭创建以及父母之爱的基础，被用来以一种结合了感情，责任和权威的关系将成人与他们亲生的孩子捆绑。国家，医疗机构和精神病学机构有组织地促进稳固的有生殖力的异性恋，污蔑，阻碍甚或压制其他形式的性关系，通常将它们定义成变态病态或不负责的性关系。

假设许多基本需求只能在家庭内才能够得到满足，只要按照这种方式组织社会，那么处于家庭边缘或

没选择家庭生活的所有这些人就很难满足他们的需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家庭形态以异性恋准则为先决条件，并再生它，这种准则遍布于国家与社会，对任何想要挣脱它的人采取压制。只要异性恋还是建立家庭的基础，那么情感和性生活大部分以同性爱恋为中心的人就被家庭生活边缘化了。只要家庭是养育孩子的主要地方，那 LGBT 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被疏远，比一般的孩子和青年在家庭中遭到的疏远更严重；这些孩子通常被限制接触成年人，尤其是未婚成人，以及与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其他孩子。只要异性恋的爱欲和浪漫盛行于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那 LGBT 人士就会自己无足轻重。只要国家，医疗机构和精神病学机构将异性恋当作一种准则，那 LGBT 人士就会明里暗里遭到歧视和边缘化。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压制性的法律和广泛的社会歧视都在增强这种压迫，撤销压制性的法律，与社会歧视抗争本身不能独立废除这种压迫。

——节选自第四国际第十五次世界大会决议《论同性恋的解放》